

缅怀罗卡尔总理

陈彦



离我们而去。没想到，他 6 月 27 日下午的邮件，竟然是给论坛留下的永别遗愿！

从 2005 年 10 月至今，中欧社会论坛走过了 11 个年头。自论坛 2005 年第一次南沙大会开始，罗卡尔总理参加了论坛的每一次重要活动。作为论坛创始人，他不仅用其言论引领论坛的方向，也身体力行陪伴着论坛的脚步。今年 6 月 27 日上午，我给罗卡尔先生发去邮件，希望就我们在 2016 年 9 月南特世界气候峰会上组织中欧绿色基金会对话向他求教。当天下午，我即收到他通过秘书发来的回复，告知他目前身体疲惫，估计此次无法参与论坛的活动，希望我们会议取得成功。我当即有一种不安的预感，立即电话通知论坛协会主席、同为论坛创始人的张万亭先生。万亭先生同他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同窗，几十年如一日，同声相应、同气相投。29 日，万亭先生告知，罗卡尔病重住院，我心中的阴影愈益加重。7 月 2 日，噩耗传来，罗卡尔先生撒手人寰，

罗卡尔的去世引起法国政坛的震动，他不仅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政治家，也是政界少有的思想家。他是当今法国少有的左右翼均十分尊敬的政治人物。右翼尊敬他，由于他的高风亮节，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左翼尊敬他，那更是由于他为左翼留下了重要政治和理论遗产。法国现总理瓦尔斯表示：罗卡尔的去世让他有成为孤儿的感觉。将瓦尔斯的这句话移用到中欧社会论坛也是十分贴切的。长期以来，罗卡尔总理对论坛的活动有求必应，无论是在何处，无论涉及什么内容，无论以何种形式，他总是给予肯定的回答。论坛开启的中欧社会之间尤其是民间社会的对话，他全身心投入。从 2005 年开始，他不仅在论坛组织的活动中阐述中欧对话的重要性，也充分利用媒体推荐论坛的活动。一直到他逝世前一周，在被称为他的政治遗言的对法国《观点》周刊的访谈中，他仍然不忘提到他是中欧社会论坛的创始人。近几年来，罗卡尔一直病魔缠身，但他一直以达观的人生态度和坚强的意志与病魔战斗。直到逝世前夕，他还在安排其写作计划。就在他离开我们的前一年，2015 年，罗卡尔还有两部著作问世，两部书均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反思当代民主社会和资本主义运行所出现的偏差。在他看来，现代社会正在急剧滑向金钱和数量的陷阱。他呼吁人类苏醒和振作，重新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共生价值，回归理性，求得人类后代对我们的谅解！

罗卡尔的去世使中欧社会论坛在吴建民大使之后再失去一位创始人，失去了一位高山仰止的精神导师，一位不可替代的政治支持者。对笔者本人来说，罗卡尔的去世也使我失去了一位绝无仅有的良师益友，一位志同道合的先行者！论坛的创立是我得以认识罗卡尔的机缘，论坛活动的持续是我们得以维系十多年的友谊的桥梁。通过这一桥梁和平台，我们得以交流对欧洲联合、对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秩序、对气候变化、保护极地等当今人类重大问题的看法。2013 年，罗卡尔邀请我同他合作，写作一本有关中国与世界的专著。他将拟好的提纲发送给我，我们也一起讨论过有关的重点。我知道他对于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的影响有着精当和独到的看法，希望能够表述于世。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等问题上我们却可以互补。然而，2013 年，论坛正处于转型之秋，将曾经纷纭广泛的讨论维度渐渐集中于可持续发展、绿色转型的主题上来，我实在无暇从事写作，于是写作计划一推再推，最后终于没有能够如愿同罗卡尔总理合作著书。现在回想起来，不仅万分有愧，也成为我自己的终身遗憾！同时，由于此书最终没有问世，也使得罗卡尔失去了系统表述其中国观的机缘，使得我们没有能够留下这一笔智慧的财富。

罗卡尔对中欧社会论坛的支持，源于他对中国的重视，源于他对世界全局的观察和洞彻，源于他对欧洲联合的信心和希冀，更源于他对于中欧之间民间社会对话的重视。他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参与世界事务决策，将会对世界平衡产生冲击，而对于这一前景，必须通过对话解决，否则战争就离我们不远。在 2014 年论坛第四届大会上，罗卡尔表示：

中欧社会论坛的创建基于这样的一种认知和确信——13 亿中国人民和 5 亿欧洲人之间的联系是如此重要，绝不能只局限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 25 位成员和 28 位欧洲专员以及包括法国在内的部分政府成员之间，这样的联系甚至没有意义。为了建立对和平的必要共识，我们需要在彼此间建立一张涉及面广、且源源不断的关系网络：

包括个人联系、技术联系、科学联系、知识界的联系、文化的联系，以及当然包括在内的经济商贸联系。这些联系不仅可以化战争于无形，更能够增进相互了解、为妥善处理矛盾创造必要条件。

在罗卡尔看来，人类未来发展的第一要件是和平。从欧洲联合和平进程的经验出发，罗卡尔坚信要缔造更为广泛的世界和平只有同中国展开充分的对话才能够达到。而这一对话不仅是政府间的，更重要的是社会间的，是将社会各界尽可能广泛地包罗进来的对话。只有建筑于全体公民对和平共识基础之上的对话，和平才有根基，世界才能有和平的希望，人类才可能有共同的未来。而这正是中欧社会论坛存在的意义！

永别了，罗卡尔总理！我们将永远记住您的遗愿，继承您的遗志，将中欧对话推向前进！

中欧社会论坛缅怀米歇尔·罗卡尔总理

- **张万亭 (Trần Van Thinh Paul)，中欧社会论坛协会主席**

在米歇尔·罗卡尔的政治遗愿里，他对中国及其五千年历史、尤其对新近中国南海全面开发的观察与分析是惊人的。罗卡尔的视野解释了为什么 2005 年他与我参与了在中国南沙举办的第一届中欧论坛，这是卡蓝默的一个极具开明的创意。

欧洲，这个人类历史代际的和平杰作、我一生奋斗的目标，米歇尔的观点没有我乐观。

作为米歇尔的老同学，我学会了认识他，了解他，赏识他，分享他的道德和新教价值观，尊重他和敬爱他... 这是一位和平的斗士，一位先知。我总有一天会在他安息的科西嘉岛蒙蒂塞洛... 唤醒他。

- **乔治·贝尔图安 (Georges Berthoin)，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欧洲联合创建者**

在政界里，像米歇尔·罗卡尔这样被一致公认的，的确罕见。这位公众人物的形象和与其个人的原则和道德融为一体。这种诚实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尊敬和爱戴地聆听他。我们信任他，往往政客试图征服但未能成功的地方，米歇尔·罗卡尔都成功地做到了。他对各种技巧的掌握，并结合其对公正和人道社会的理想，使他总是做出知识、胆略和智慧的行动选择。他对所有他认为有利于人类进步的理念和项目都保持极大的兴趣。

正因为此，尽管年事已高，并享有国家最高职能的待遇，他还是选择加入到未来，把全部精力和威信投入到创建中欧社会论坛这一伟大事业。中欧两大文明是世界历史上最有创意和古老的文明之一，我们正在为明日世界携手行动。对他来说，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民间社会对话是紧迫和必要的，米歇尔·罗卡尔自始至终以其旺盛活动家的奉献和无限的热忱参与其中。他认为，人类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现代中国与统一欧洲之间的和谐，因此他不能够缺席。这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之一，而且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许多曾经辉煌一时的公众人物往往被人们所遗忘。然而，人们的记忆将永远怀念那些给予民众之生活期望的人，犹如纳尔逊·曼德拉。米歇尔·罗卡尔便是其中之一。

- **卡蓝默 (Pierre Calame)，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名誉主席**

多少年来，在我欣赏、感激和深情的眼里，米歇尔·罗卡尔不愧是一位赋有远见活动家的典范。能够认识他并与他分享那么多不平凡的经历，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中欧社会对话便是其中之一。2005 年，当我邀请他到中国南沙向中国听众介绍欧洲统一进程的经历时，他像一位战士一样毫无条件、毫不拖延地应允了我，因为在他眼里，这是非常值得的，足够的。他清楚地知道，中欧实施的方式和面对的挑战是不相称的，然而有必要走出这一条路。大家聚集中国南沙，聆听乔治·贝尔图安的见证，米歇尔·罗卡尔和欧盟谈判代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建筑师张万亭对欧洲统一进程的回忆和理念，包括曾使斯洛文尼亚从共产党政权走出并加入欧洲联盟的米兰·库常、以及其他欧洲建设的重要见证人和参与者的经验讲述，这难道不是回应中国社会渴望了解欧洲联盟历史

和兴趣的最佳方式？因为，米歇尔·罗卡尔以其开放的思维，首先明白了中欧社会的对话不仅可以为双边社会，而且世界的未来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因为，不同于许多被自己角色捆绑住的政治家们，米歇尔“感受着”这个世界，作为孜孜不倦的和平活动家（他的最出色著作之一便是《和平的艺术》），他深深明白，两个社会之间的了解并超越无知、不信任和历史预留下来的怨恨，将是世界和平的根本。那么，对这位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最受尊敬的总理来说，由民间社会力量推动的对话是多么的重要！他朝着这个方向前行，并指明了道路，这就是他的承诺。中欧社会论坛十几年来，始终秉承这一承诺，而他，包括在他的政治遗愿，始终是论坛的坚定推动者。

• **于硕，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香港理工大学教授**

法国前总理罗卡尔(Michel Rocard)7月2日巴黎时间晚8时28分离世，享年85岁。亲友哀痛神伤，世界扼腕叹息，“20世纪最优秀的政治家”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了这个芜杂的世界。我们管他叫米歇尔，他是我参与创建和主持过的中欧社会论坛的创始人之一，长达五年的共同工作使我懂得了欧洲建设是一项人类和平建设的“现实主义乌托邦”宏图，让我得天独厚地感受“人类政治”的智慧之光，懂得了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需要以求真和至善作为存在的基底。这位终生致力于抵抗法西斯、捍卫人权、推动欧洲建设、主张人类共生的老战士蹒跚而去，全球政治最清澈的一道光明消失了。终生不放弃，也许他还会在天上期盼人类精神停止倒退滑坡，走出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愚昧的分离主义，最终懂得相互协助精神是人类唯一的出路。

• **弗朗辛·库斯托 (Francine Cousteau) 女士，库斯托协会主席**

敬爱的米歇尔·罗卡尔，从您安寝之地，传来一声轰鸣！

您的天赋、远见、智慧、勇气和力量迎击万难，成就非常之事，如签订《新喀里多尼亚和约》，如保护环境的《南极条约50年》，又如《堪培拉消除核武器委员会》的创立等等。

您洞悉全球环境问题的根本，深知应对环保挑战的全盘考量。正缘于此，您历次支持海洋探险家雅克-伊夫·库斯托的重要探险活动。

安息吧！政界人士正在觉醒，各国民众正在省悟，并继续您的未竟事业。

感谢您2016年1月的最后一次来电！您志在保卫我们的蓝色星球，使之不为世界各地的蒙昧之徒所贻害。我见证了您坚定不移的信念，也见证了您对继续环保事业的热切期盼。

您在2012年曾说过：“我们必须战斗。”

库斯托也说过：“若要成功，就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一点，他与您心照不宣。

您在天国安息吧，这场战斗必将获胜。因为在您的感召下，那些勇敢、正义、热爱和平的人们正在振臂疾呼，纷纷投身于此，继续您未竟的事业。

感谢您，米歇尔·罗卡尔，这个世界还需要许许多多像您这样的人。

• **冯凤阁 自由撰稿人**

7月3日，我十分悲痛地惊悉米歇尔·罗卡尔先生与世长辞。就在前一天，他的妻子西尔维曾邮件告诉我罗卡尔住院了。我和他第一次见面还是在2005年在中国南沙举办的中欧社会论坛。

罗卡尔先生开放的胸怀和改革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法国政坛，这从他去世后来自四面八方的悼念足以证明这一点。这是一位具有坚定信念的欧洲斗士，作为中欧社会论坛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予余力地支持论坛的活动，就在逝世前一周接受《观点》周刊的长篇访谈中，他还突出强调了论坛的角色作用，这篇访谈竟成为他最后的政治遗愿。

法兰西共和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中欧社会论坛失去了一位坚定和宝贵的支持者。

• **沈菲，法国2030大洋能源有限公司亚洲区副总裁兼运营总监**

听闻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7月2日巴黎时间晚8时28分离世的消息，内心很是悲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一位伟大而智慧的老者带着遗憾离我们而去，甚是难过。曾有机缘在中欧社会论坛时陪同罗卡尔先生，接受各国媒体专访。当天的采访日程从早到晚安排得尤其紧凑，那时已近八旬高龄的老先生还发着高烧。采访期间，想和先生沟通一下，能否将其中几个媒体采访改期；但是，老先生执意按照原定采访计划进行。这位终身致力捍卫人权、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左翼政治家，始终认为在履行好欧洲议员的本职职责之外，需要通过各种平台宣扬人类相互协作、欧洲协同发展的理念，其敬业精神和坚强意志让人敬佩不已。整整一天采访结束，已近黄昏；老人家让我陪同他到布鲁塞尔市中心他常去的一家普通餐厅用餐。一路上，总是不停地有行人向这位老者点头致敬。在那个时刻，我就想，所谓伟大的政治家，真正赢得的，并不是哪一个统治者的宝座或极端无限的权力，而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爱戴和尊敬。

- **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2015和2016年曾两次在巴黎见到米歇尔·罗卡尔总理，倾听他充满智慧的发言，与他合影留念，一切都还历历在目，如今他却离开了我们，让我们深感悲痛和惋惜。米歇尔·罗卡尔总理对中欧友好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所付出的努力和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激励我们继续努力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米歇尔·罗卡尔先生千古！

- **黄海峰，国际生态发展联盟全球执行理事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惊悉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之一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先生去世，万分悲痛。请允许我代表国际生态发展联盟，对于他的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我记得每次出席中欧论坛，都能有机会与他交流，他平易近人，思想睿智，交流中，都能深深感受到他对中国的友善，他对中欧发展的关注。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教育家，一位和平的使者，一位传递爱的长者。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深切缅怀，继承他的遗志，将他开创的中欧社会论坛事业继续下去。

- **赵绒，广东省节能协会、广东经济投资促进会会长**

惊悉米歇尔·罗卡尔总理——中欧社会论坛支持者不幸离世，在此，我代表来自广东节能协会、广东经济投资促进会全体同仁表示深深的哀悼。

中欧社会论坛经历了包括米歇尔·罗卡尔、吴大使，以及众多的，热心促进中欧社会、文化交流发展的各界友人的共同努力，使得论坛逐渐在中欧两大板块上得到认可，是来之不易的，是值得纪念的，是值得传承的。

我们在纪念这些离世的智者的同时，也应该传承他们的智慧。让中欧社会论坛的硕果结的更多，更丰富。

仅此短文纪念这些智者，寄托我们的哀思！

- **李俊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悲痛中！

- **周永章，中山大学地球环境与地球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低碳产业技术协会理事长**
深深怀念米歇尔·罗卡尔总理！

- **蔡穗声，广东省房地产业协会会长**
沉重悼念。

- **黄浩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沉痛哀悼罗卡尔总理！

- **张艳波女士**
沉痛哀悼罗卡尔总理！

- 周晓翔，大爱清尘四川工作区主任
沉痛哀悼罗卡尔总理！
- 刘选国，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
沉痛哀悼罗卡尔总理！
- 罗红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欧洲学会欧洲经济研究会会长，北京益地友爱国国际环境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沉痛悼念中国人民的朋友罗卡尔总理！
- 官建文，人民网副总裁、研究院院长
沉痛哀悼罗卡尔总理！
- 姚军，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沉痛哀悼罗卡尔总理！
- 刘焱，中欧社会论坛特别顾问
很悲痛听到此消息，近期论坛失去两位创始人，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且行且珍惜，再接再厉，把前辈的宏愿继续发扬！
- 张仁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顾问
感恩！永记罗卡尔—— 实践人类之至善，创造千古之历史！

2005 - 2015 : 《罗卡尔与中欧社会论坛》

- 2015年12月5日 巴黎:法国前总理罗卡尔出席中欧社会联合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对话会暨“中欧绿色奖”颁奖式，并在会上致辞（概要）



罗卡尔：“我非常感慨地在这里说几句话。（…）现在，我们所经历的不仅是金融风暴、生态挑战以及气候变化的威胁，而且正在学习其他事务。谁能想到十或十五年前，13亿人口的中国和5亿人口的欧盟能够建立如此的对话？中欧社会论坛从小规模起步，但它是必要的，能够起步就已经显示出了我们双边之间的愿望。它但没有被禁止，而且聚会不断增加。我为像今天这样丰富的创意、技术、管理交流以及共同筹资意愿着实感到欣喜。我们正处在一个了不起的时代，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国与具有3000年文化历史的欧洲及其数以百计的战争，我们彼此发现自己，发现对方，使中欧社会论坛历届大会得以实现，这是巨大进步的标志。（…）我很高兴出席这个颁奖式。此次会议可以代表论坛创建10年来的第5届大会，这也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我今天带着激动的心情出席这个颁奖仪式。要想成功大事，我们必须从小事做起。”



- 罗卡尔在“中欧绿色奖”颁奖式上为“十佳绿荫基金会奖”颁奖

➤ 2014年12月5日：法国前总理罗卡尔出席第四届中欧社会论坛《应对气候变化 反思发展模式 共建公民伦理》闭幕式并致辞

亲爱的朋友们，

我非常高兴今晚能站在这里，一会儿我将为大家解释这样说的原因。很遗憾由于事务缠身、时间仓促，我没能够全程参与你们的工作，但无论从情感上还是象征意义上，我都非常荣幸能够来进行闭幕发言。首先，在这个会场我们只有两百多人，但这丝毫不能掩盖我们共同举行、共同经历的是一场意义非凡的盛会。首先请允许我，向孜孜不倦的中欧社会论坛主席、我的老友陈彦先生致敬，是他的坚韧不拔促成了中欧社会论坛的第四次大会。早在2005年在中国南沙举行的中欧社会论坛第一届大会，我就有幸参与其中，并在参会嘉宾中发现了不少当时的名人身影。论坛第二届大会于2007年在欧洲举办，40个城市都举办了小组讨论，其中最后一站在布鲁塞尔。论坛第三届大会是在香港和上海举办。我协助举办了这三次大会，而如今我们已是第四次大会，这也是第一次专业主题性的大会。我想重申你们选择气候变化作为大会主题的深远意义：它全面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和中欧民间社会的联系。

中欧论坛的出发点来自于这样一个观察：正在苏醒的中国将参与世界事务的决策：事实上中国已经充分参与其中，这引起了不少人的恐慌。在全球范围内甚至也许在中国，至少据我所知在美国，部分人认为由此造成的对世界平衡的冲击、实力及国家关系的重大改变将导致不可调和的矛盾且最终诉诸武力。如今有部分人主张以战争来解决这些矛盾。对于这种走向，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应该立刻从源头进行扼制。

我们其他的欧洲人有一种悠久的传统，引导着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道理：国家之间通过相互合作可以促成很多大事，这种合作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层面，还需要通过围绕着政府以及政府层面之外的民间社会、企业、非政府组织、协会、个人、大学达成共识、共同推进。纵观法国历史，我们维持着紧密的多边关系，首先是同我们的邻邦：德国、英国、西班牙等，以及拉美国家、非洲国家。我们已与非洲友国成功解除了殖民关系，但还保有相互尊重的国家情谊。在中东地区，法国确实与阿拉伯国家有着紧密联系，但与其他很多国家都没有建立这样的往来。法国，甚至整个欧洲，同中国都没有这样紧密的联系，我们彼此并不了解。你们的苏醒将带领中国走出这种隔离的处境。中欧社会论坛的创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和确信：13亿中国人民和5亿欧洲人之间的联系是如此重要，绝不能只局限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18位成员和28位欧洲议员以及包括法国在内的部分政府成员之间，这样的联系甚至没有任何意义。为了建立对和平的必要共识，我们需要在彼此间建立一张涉及面广且源源不断的关系网络：包括个人联系、技术联系、科学联系、知识界联系、文化联系，以及自然包括在内的经济商贸联系。这些联系不仅可以化战争于无形，更能够增进相互了解、为妥善处理矛盾创造必要条件。

中欧社会论坛在南沙举行的第一届大会，旨在让60多位欧洲嘉宾回答来自中国的一个疑问：“上帝啊，这样一个没有外交政策、也没有军队的欧洲，到底意味着什么？你们如何一较高低？这样有什么意义？你们都在做些什么？”这样的疑问是引人注意的。当时有200位中方嘉宾提出疑问，我们相互进行了很多交流。两年之后，在40多个欧洲国家，人数有所增加的中国嘉宾开始认识欧洲这个民族的大熔炉：在这些民族之间爆发过很多战争，欧洲也是全球战事最多的大陆。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学习如何用非军事手段、通过彼此交流、尤其是文化方面相互认知来进行调解。之后在香港和在上海的第三届大会，我们进一步深入话题，开始从公民层面、哲学层面以及深层文化层面探讨双方民族的优先问题。这样的议题也是非常引人入胜的。我想说的是，眼前的第四届大会，我们已经过渡到专业领域的探讨。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我们是否能够互相理解？我们是否能够从我们不曾获悉的信息中有所得，并且相信这些事实和分析？特别关键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共同反思应对当前恶劣环境的解决方案？当然，除了气候变暖之外还有别的议题，但这一个就足够我们讨论了。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府生态顾问 Marie-Hélène AUBERT 女士也部分参与了我们的工作。她的出现代表了来自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本人对我们的支持与赞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前任、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组委会秘书长 Pierre Henri 先生也是由总统直接选任。由此可见，我们的大会既不是擦边球更不是绣花枕头，而是受到法国国家政府高度肯定的。同时，作为现任总理 Manuel Valls 先生25年的老友，我曾再三和他提到中欧社会论坛并恳求他来与我们见面，他委托我向大家转达他因为事务缠身而不能亲临现场的遗憾，想必大家都能够理解他的日理万机。但无论如何，我受 Manuel Valls 总

理先生之托向大家转达他对我们这一主题的赞同与支持。同时，我敢断言，你们即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共识文本的最终版会是创新的、意义深远的力作。你们为此投注了很多心力，我深知并且相信这些付出都会结晶成最后出版的成本并带来深远的影响力。

气候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对此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私人的小秘密。当奥朗德总统决定法国将承接举办第二十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时候，我是曾经劝诫过他的，因为当时我因为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失败而感到灰心。在那之前不久，我还曾因为京都气候变化大会的部分成功而有些燃起希望，我也是欧洲议会致力于碳交易、控制排放系统成员中的一个，而京都气候变化大会中做出的提议，只有欧盟贯彻施行了。因此，不管是在我任职总理期间还是在我之后的职务中，我一直投身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阵营中。

感谢 Christophe Girard 市长先生对我们的盛情接待。他提到了我现在的一项特殊职务——我一直是法国外交关系中负责两极地区问题的大使。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途径并不是藏在极地地区，而藏在在温室气体的排放地、藏在气候变暖地区，而不是在南北极。但南北极却是气候变化但主要受害者：北极地区的升温速度比其他气候变暖地区要快三倍。



北极不仅有珍稀的濒危动物，如今它更成为石油资源的探索地和科学考察地，之后它将可能成为新的、广袤的渔业开放地，从更长远的角度，它毫无疑问将是重要的航海商路。中国以这样的方式大力宣传对北极发展的希冀和宏图。我甚至听闻来自中国方面对于北极理事会办事效率相对低下的非议。我对此表示赞同，这也是第一次我完全地与中国外交意见站在了同一阵线。我们共同面对的，是气候问题带来的后果。然后气候问题是一个庞大的议题，正如刚才 Christophe Girard 市长先生一再强调、尤其是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组委会秘书长 Pierre Henri 先生详细阐述的那样，如果各国政府无作为，将会把人类带向自我毁灭。我们都知道，政府必须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甚至是世界范围的强制性措施。这是我们对于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期许。但仅仅依靠政府，我们并不能促成工业生产减少石油和碳资源的消耗、增加新能源的使用，并不能实现生产工艺的节能化，更不能弱化人类生产、消费、是食用等人类活动对大气带来的影响。在气候问题上，我们大家都是共犯，并且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我们的政府相对保守，需要来自民间社会的警钟，比如我将会仔细研读你们工作的心血结晶共识文本。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推动政府做出更多举措，而不仅仅停留在投票所达成的简单共识？因为这些投票所达成的简单共识对于我们的行为规范、社会收益、优先权或福利没有丝毫限制。我们必须向政府进言，促使他们采取强硬措施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出行方式以及粗放型的资源消费方式以控制肆意消费带来的废弃物。

中欧民间社会开始携手共议气候问题，让双方都看到了希望。今天参与大会的来宾，在会议结束之后会向他们所在的大学、当地的媒体转述我们今天针对未来社会行为规范所达成的共识。不要因为今天的活动只有两百余人就忽视它的重要。今天它的规模还很小，但它是应对气候变化这场深远战役的导火索。我今天来到这里也是想在大会的最后向你们致敬，组织一场民间社会对民间社会的活动并不容易，因为在公共预算中并没有这样的资金支持。我们的财政投入永远跟不上这类民间活动增长的需要。而像本次大会这样的民间活动是非常有必要的。你们用坚韧不拔的贡献弥补了资金的不足，这贡献来自你们在位的全体。因此，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阔别九年之后与南沙论坛中的几位知名参与者重逢。

请不要低估你们正在起步的这项事业，留下各自的联系方式，会后继续交流，透过互联网让大会产生的相互情谊得以延续、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关系得以开展。这才是本次大会的精神所在。我感到高兴的是，本次大会的成功召开不仅受到来自国家政府的关注，大会的成果还将送呈给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大使。你们是否可以想象我激动的心情？我不得不向你们坦承，在中欧社会论坛的启动伊始，我们只有 35 到 40 位欧洲嘉宾奔赴南沙大会，我们对于自己开启的这项事业充满了疑惑，疑惑于它是否能够持久，疑惑于来自大学的代表是否足够，疑惑于中国的学术界是否可以延续这项工作，疑惑于中欧双方的企业家是否愿意参与我们的阵营，而如今这些疑惑都消除了！崭新的事业开启了，一切都有了可行性，感谢你们将这项事业变成了可能，感谢你们大家并恭贺你们的成果！

中欧联手应对气候变暖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访谈（2014年）

【罗卡尔】：人民网的网友们大家好。

一、“我无时不在期望欧洲大陆统一”

【中欧社会论坛小秘书】：我们知道，您一直是一名坚定的欧洲联合的拥护者……

【罗卡尔】：1945年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便成为坚定的欧洲联合的拥护者，如今已有68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目睹了集中营的幸存者返回法国的情景，十分恐怖。大概就在这段时期，我在课堂上了解到德国总理希特勒，这个邪恶的化身，不是通过政变而是通过全民选举，通过选票，也就是通过政治上台的。我意识到了政治之重要，也意识到，只要欧洲持续分裂，就会有危险。从那时起我就无时不在期望欧洲大陆统一。

二、欧盟是唯一一个严格执行《京都议定书》的大陆

【中欧社会论坛小秘书】：您担任欧洲议员15年之久，您认为欧洲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是否扮演了一个领跑者的角色？

【罗卡尔】：不完全是，但欧洲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还是比其它国家做得更多。应对气候变化不完全是经济问题，可欧洲联盟建设之初仅限于经济领域的联合。欧盟创始人曾梦想建立一个在各个领域都有权威的政治联邦，但欧盟目前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只要超出了市场运行领域，任何比较新颖的、不属于经济范畴的重要决定都需要全体一致通过，但这样根本无法运转，因为欧盟现在有28个成员，总会有成员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提出反对意见。也就是说，欧洲政治联合运转不灵。但作为一个联合经济体，欧盟迫切希望为其它国家做出表率。在一些经济生活的道德规则制定方面，欧盟这样做了。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欧盟也试图这样做：欧盟是唯一一个按照《京都议定书》制定了遵守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限额机制的大陆。京都议定书的内容针对全世界，但只有欧洲执行了，连中国都没有这样做。所以说，欧盟还是发挥了榜样作用。但这种限额机制目前运行尚不完善，况且，这种机制只有扩展到全球才有意义。但如果其它国家能仿效欧盟，在下次气候大会上能做出完善这个机制的决定，特别是能将它推广到世界各地，那就太好了。但这当然需要中国的支持。

三、中国可借COP21向世界展示自己努力的成果

【中欧社会论坛小秘书】：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前6个月，您就曾预言大会将会失败，最好将大会推迟。您当时就不看好大会前景么？

【罗卡尔】：是的，因为在大会召开半年以前，我就已经知道没有任何协定进入筹备阶段，各种外交磋商进展困难。当时有好几个不同立场的国家团组，其中阿拉伯石油生产国、俄罗斯和美国都在努力维护各自的自主权，以便能继续各行其是，他们不想达成有约束性的国际条约。哥本哈根会议是一次彻底的失败！

【中欧社会论坛小秘书】：您对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会有何期待？

【罗卡尔】：2015年我们首先期待更全面地了解各国在国内所做的努力，因为，在整体的全球性法规之外，一些技术革新可以减少取暖或交通手段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有些国家在这方面可能很超前，很有创意。所以，巴黎气候大会的意义之所在首先是各国意见交锋，哪怕峰会最后无法达成协议；其次，其中有些信息也许有望全面推广，这已经不错了。再次，我当然是希望能够达成一项有约束性的条款，比如，将目前尚不完善的排放限额机制推广至全世界。16年前，京都议定书1997年签订的时候，在原则上就此达成了一项全球共识，这很难得，应该充分利用。我不认为这是最好的机制，我认为最好的机制是在世界范围内征收碳排放税，这样可以推动大家改变行为方式。从目前的外交磋商进展来看，很难预测最终能否做出决定，但巴黎气候大会可以在这方面着手准备，使大家在思想上习惯于有约束性的措施，如果掀起关于此项议题的辩论，我们会看清哪些国家抵制、哪些国家赞成有约束性的措施。其实，目前

人们对危险的认识正在提高，即使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也不例外。

【中欧社会论坛小秘书】：中国人也不例外……

【罗卡尔】：中国太远了，我们对中国了解不够，不知道中国在国内做了哪些努力。但我们知道，最近四、五年，中国在各个方面的环保意识明显增强，无论是在自然资源、自然景观遗产破坏等议题，还是在煤炭的危害、垃圾处理，或污染等领域，中国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减少破坏，加强保护。但我不知道这些改善环境的努力，是否也包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我希望在 2015 年巴黎大会上能对此有所了解，或许中国人会亲自告诉大家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总而言之，不仅中国中央政府和行政部门要付诸行动，而且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学和所有有专长的人都参与努力。很明显，最明智的办法是在全世界征收碳排放税，尽管这种观点要在全世界传播开来，恐怕需要 10 年或 20 年，但总归要从某个时候开始起步。

【中欧社会论坛小秘书】：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有舆论批评中国延缓减排谈判，你觉得 2015 年的巴黎气候大会可以是中国改善国际形象的机会吗？

【罗卡尔】：我希望中国这样想，我希望中国在 2015 年气候大会时努力改变自己的国际形象。但我们不要忽略细节，要全面了解中国立场的来龙去脉。其实在哥本哈根峰会上，中国方面并没说“我反对一切国际条约”，中国只是说，目前问题非常严重，制定条约甚至是国际性条约未尝不可，但中国不希望由他国监督中国在国内的所作所为。我们对你们这些国家不信任。西方大国曾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曾经攻占中国，甚至曾向我们输卖鸦片摧毁我们的意志，迫使我们向西方更加依赖。经过这样一段历史，中国对西方的看法不会是友好的。我们不确定你们西方人对中国已经没有恶意，因此我们不信任你们。如今西方仍然主导世界，倘若由你们这些西方国家来监督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所作所为，我们不能肯定这种监督是客观的。所以我们信不过。中国在哥本哈根的表态是，“我可以接受你们提出的几乎所有建议，但是我不希望接受可能并不友好的国际监督。”这是可以理解的，消除不信任需要有长时间的合作。假如巴黎峰会不能取得成果，因为谈判来不及取得足够的进展，我希望这次会议可以促进彼此尊重，促进消解历史遗留下来的不信任和不友好。

四、法国期望获得中国的理解与支持

【中欧社会论坛小秘书】：您对这次巴黎气候峰会的前景比较乐观么？

【罗卡尔】：是乐观还是悲观，我不善于使用这种情绪概念。我很清醒。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非常艰难，也必然道路漫长，但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有耐心，有决心，就会取得进展。不过，我几乎可以肯定，巴黎峰会上不会有特别大的进展，只可能有些小的推进。

【中欧社会论坛小秘书】：您是否可以具体说明这些“小的推进”指什么？

【罗卡尔】：比如加深相互理解、促进信息互享，比如接受成立工作小组，讨论“明天我们将如何做”，讨论如何在更多国家设立减排限额机制；还比如，也许可以成立一个世界性的工作小组商讨碳税问题，这可能需要 30 年的时间，那就不用 30 年的时间，重要的是立即开始。巴黎峰会可能产生的是这类成果。总之，不必对此次峰会期望过大，不能提前断言倘若没有具有约束力的整体性措施，就意味着峰会失败，事实并非如此。

【中欧社会论坛小秘书】：您认为法国在 2015 年的全球气候大会上扮演何种角色？

【罗卡尔】：这次气候大会是国际会议，我还不知道会由哪个国家以联合国的名义来主持会议。大会将选举一位主席，可能不会是法国人，可能也不是联合国官员，而是某个国家的代表。作为东道主，法国肩负双重使命，首先，法国要做大会开幕致辞，开幕致辞通常只是礼节性辞令，无实际作用，但如果纳入重要的、不同寻常的内容，开幕致词本身就可以形成事件。其次，作为主办国法国负责会议的所有后勤准备，如果临时增设一个目前没有安排的碳税问题工作小组，那就要立即安排场地、翻译以及工作所需的其它条件，以便在大会之后，工作小组能马上召开第一次会议。这些都非常重要。另外，在这类会议中，主办国的外交工作非常重要，主办国是最希望促成会议成功的国家，这是提升法国国家形象的好机会。法国很清楚这一点，外交工作因此不得不具有更多的干预性和更大的说服力。如果能够得到中国的理解支持，法国在这方面会做得更好，中欧社会论坛的巴黎气候大会可以在这方面为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做准备。

五、“极地保护大使”与南极条约谈判

【中欧社会论坛小秘书】：您在 2009 年被任命为极地保护大使，在保护南极协议的签订过程中出力颇多，为何如此心系环保事业？

【罗卡尔】：我倾心环境保护其实早于极地环境保护。小时候我参加一个青少年运动：童子军。这段经历留给我很多美好的回忆，我热爱森林，热爱动物在林中散步的那种美好景象。我在这种尊重大自然的意识中长大，此后一直保持了这种意识。后来，各种自然生态遭受破坏对人类和其它生灵生存构成的威胁更坚定了我的环保意识。这些都早于我对极地环境保护的关注。

我对极地事务的关注，缘于偶然，就像《高卢英雄历险记》的奥普利克斯（Obélix）掉进魔法药水一样（《高卢英雄历险记》是一部法国尽人皆知、令人捧腹的系列连环画）。这个偶然的机会有发生在我担任法国总理的时候。政治生活中很难有朋友，因为这是一个艰辛、残酷、野蛮的职业，各种利益对立，产生的更多是不信任而不是友谊。但当时前法国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Nouvelle Calédonie）内战初起，我负责化解危机，这为我赢得了岛屿邻国澳大利亚时任总理霍克（Hawke）的友谊。1989 年他受邀来巴黎，在一次谈话中，他对我说，“米歇尔，南极情况很糟，我们应该做些事情”。我们俩都想做些努力，于是我们打破行政程序常规，对国际制度发动了一次程序政变，结果便有了后来的《南极宣言》，宣布南极为科研领地和自然保护区，禁止各种煤炭、铀矿，铁矿，石油、天然气等开采。这项禁止开采文件于 1991 年签订。此后，我对南极事务的关心从未消减。因为热爱这项事业，所以我一直担任着极地事务大使职务，但这一切都开始于偶然，当然我一直关心环保事业，这一切又显得合情合理。

【中欧社会论坛小秘书】：您是南极条约的起草人之一，根据当时的谈判经历，对于 2015 年全球气候大会的谈判，您有什么经验值得分享？

【罗卡尔】：每项谈判都有各自的特点，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分享的经验。气候谈判与利益谈判非常不同，利益谈判中，只要人们不想发生战争，就会在利益方面相互妥协。利益可以是金钱，是领土，是交换囚犯、削减武器、或诸如此类。但关于象征符号的谈判则大大不同。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还是巴勒斯坦的首都？是两者之一的首都？还是两者共同的首都？这个象征符号不容置疑，也充满矛盾。这可以谈判，但结果只有肯定或否定两种答案，除非发生奇迹，让双方都愿意推动这个象征从矛盾走向一致，但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民主也属于象征意义的命题，但尊重自由还是不尊重自由，摒弃独裁还是保留独裁，这也是非黑即白。因此，首先，这不是同样一回事，其次，当前我们面临的难题和当初也多有不同。

《南极环境保护议定书》得以在马德里成功地签订（1991），是因为我们在 1990 年发现美国坚决反对这项方案后，我决定由法国出资，派遣以生态保护著称的海军军官雅克-伊夫·库斯托船长（Jacques-Yves Cousteau）赴美国举办各种讲座，播放他的电影“沉默的世界”（Le monde du silence）。这部影片展示了海洋生态的恶化，尤其是物种赖以繁衍的冰川的融化。雅克-伊夫·库斯托还多方游说美国参议员，告诉他们，“注意，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扮演什么角色，你们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成功说服了很多人。这可谓干预别国内政典型的一例，但这是一个私人行为，因为库斯托是个商人，归根结底，他是在兜售他的影片，虽然整个事件其实由法国政府牵头，但这并没有被发现。不过，不是所有的谈判都能用这种方式。我希望当中国某一天接受制定有约束性的国际措施的时候，完全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不需要我们采取这样的方式挑战她的自尊。所以，我没有什么建议，只是有一次成功的经历。

六、法国能源改革的一点看法

【中欧社会论坛小秘书】：在环保问题上，你的观点和立场与绿党有分歧……

【罗卡尔】：我与绿党只在核电工业问题上有分歧。绿党在这个问题上态度过于绝对，我认为他们不能完全代表所有环保人士的想法。我支持环保，但我并不是绿党成员。绿党处理议题的先后顺序不妥。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确实应该放弃石油、天然气、煤炭、还有核能。但这有很大的难度，我们不能一股脑地同时放弃所有这些能源。至于其它能源，比如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的利用才刚刚开始，这些能源在世界能源总量中所占比例尚不足 2%。提高新能源比重，需要很长的时间，也需要更多新技术。所以，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放弃（传统）能源的日程表。核能开发产生的温室效应气体远少于煤炭或石油，所以，需要放弃的首先是煤炭，其次是石油。虽然从科学技术上讲核工业有许多不确定性，时而也会发生事故，但目前还是应当保存核能。

如果留意观察，我们会发现，法国大型核电生产有 60 多年的历史，至今尚未发生过任何事故。所以，不发生事故是可能的。我承认，要做到这一点，耗资巨大。法国在核电安全领域的花费比日本高 3 倍，比美国高 6 倍，可能比中国也高，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总之，这是可能的。无论如何，环保人士要求现在就放弃核电，还为时过早。现在停止核电，必然会使能源重新转向煤炭，这才是最糟糕的。我甚至想说，就这一点而言，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再是环保主义者，而更像是狂热分子。

【中欧社会论坛小秘书】：目前法国能源改革提上议程，正是由于核电问题，此项改革一推再推。您怎么看？

【罗卡尔】：问题确实存在，对此应有所规划，应当根据经济增长进行计算，预测未来 20 或 30 年的能源需求，以及如何满足这些需求。但在这项工作中，有狂热主义倾向的环保议员的政治分量过重，他们过于急切地要放缓核电工业步伐，但其实我们对核电的需求比他们想象得要高。我认为，这些人 10 年 15 年之后就会意识到这一点。那时候，所有国家都重新使用煤炭，欧洲已经不再生产核电，因为那些狂热的环保人士以及决策者使得没有人还想开发核电。目前我们还没到这种糟糕的地步，但这种反向努力的做法很危险。

【中欧社会论坛小秘书】：那您怎么看页岩气开发？

【罗卡尔】：我把页岩气和核电归为同一类，页岩气产生的温室气体比核电略多。从环保角度看，页岩气还有更深层的忧虑，因为它会摧毁岩石。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法，但它的害处比煤炭少，甚至可能略好于纯石油。因此我们应该估测它的危险性，在能源过渡一系列法案中，量化每年可以期待的页岩气目标，排除不应有的期待，因为页岩气开发毕竟有些隐患。但它的隐患比煤炭和石油要少，所以，最好还是先放弃煤炭和石油，并做出正确、仔细的计算。如果我们坚持“非黑即白”、“全有或全无”的信条，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大自然很复杂，世界上任何事情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在政治生活中，我从未看到哪个问题有完美的解决方案，面对所有问题，我们都只是在各种可能的方案中选择最不坏的方案。页岩气问题也是如此，法国是一个不太明智的国家，我们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甚至禁止研究页岩气开发的国家之一。法国是否有页岩气可以开发、开发页岩气的方式是否确实有害、危害有多大、可以持续多久……这些我们都不知道。这很不明智。

七、中欧社会论坛倡导通过谈判来解决世界问题与促进和平

【中欧社会论坛小秘书】：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2015 年在巴黎举行，中欧社会论坛于 2014 年 12 月组织中欧民间气候变化大会。您如何看中国与欧洲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对话和中欧社会论坛的作用？

【罗卡尔】：应对气候变化，世界各国都应并肩战斗。目前我们仍面临许多困难，例如产油大国不是很配合，因为针对气候变暖而采取的行动，会影响石油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包括俄国和阿拉伯国家，所以在应对气候问题上，它们参与热情不高。美国同样是一个石油大国，从一定程度上讲，美国排拒世界规则。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整体来说，从世界各州和其它政治实体来看，中国和欧洲是两大主导实体。由于中国与欧洲两者都极为庞大，双方合作或许足以应对气候变暖，至少双方合作可创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中欧两方有义务联手工作，共同寻找解决方案，即使一些石油国家在开始时会有所犹豫。我本身致力于此项工作，中欧社会论坛从发起之时便致力于中欧合作和对话，在我看来，这项工作具有决定性意义。

十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中欧社会论坛的活动，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除了应对其他重要问题外，论坛关注气候问题显然更为重要；第二个理由则是基础性的，即是对战争的警惕，因为论坛所做的工作实为倡导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世界问题，促进和平。中欧文明博大精深，但互相了解不够。几千年来，双方彼此既互不关心又互不了解，甚至发生过战争和殖民。所有这些都不能建立友谊。因此，中欧两大文明和美国，应相互了解，深化三方关系，共对应对气候和其他领域的世界难题。因此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中欧社会论坛的工作至关重要，而我一直心系此项事业的原因。

➤ 2010年7月14日：罗卡尔出席在香港举行的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并在开幕式上发言（全文）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能够在你们面前，在中欧社会论坛第三届双年聚会开幕式上发言，我既感动，也觉得自豪。

感动的是回想起2005年，离这里并不远，论坛在广州南沙诞生：这要感谢霍英东先生的远见，他希望他新开发的南沙这座城市符合珠江三角洲的历史使命，成为文明汇聚之地；同时，也要感谢我朋友陈彦先生的真知灼见，他预料到通过中欧社会论坛大家都可以获益；另外还要感谢梅耶基金会及时的赞助。



同时令我感到骄傲的是，在短短的几年内，中欧社会论坛已经成为了欧洲和中国对话中不可比拟的一个平台。

人类间相互依存的发展关系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就是最好的例证。相互理解不再是一个奢侈品，不再是相互发现和获益的愿望，而是已经成为一种必须。

传统来讲，社会之间通过外交、外贸来进行交流。但是现在来讲这是不够的。地球是地少人多，而且地球日益变得脆弱，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我们可以说是同在一个屋檐底下，一起住在一个屋子，还要共用厨房和浴室。

我们如何实现更好的相互理解呢？也许我们可以从欧洲历史的缔造得到一些启发。欧洲的缔造使欧洲人超越历史的恩恩怨怨，从历代的战争循环怪圈中摆脱出来。欧洲的缔造也许是一个独特的例子，因为欧洲人民自愿地、和平地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愿意放弃部分自主权利来建造一个共同的福祉。欧洲的缔造也说明了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范例，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多样性来缔造一个共同性，共同一致和多样性是可以相辅相成而非相互对立的，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选择凝聚，就得牺牲差异，就得牺牲多样性，否则就会陷入混乱中，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为共同的福祉自愿放弃一部分自主权，以及将多样性和共同一致统一起来的能力，我认为这欧洲的缔造就是对未来世界的两个主要贡献。

经验也告诉我们，由于欧盟成员国数目增加得非常迅速，这种体制上的安排超越了人们对共同命运体的觉悟，使得欧盟的系统越来越脆弱，失去了人们的支持，不再能抗拒民粹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兴起，并且最终使今天欧洲的体制陷入了无能中。

这种情况在世界层面也有出现。现在政府间的对话陷入了僵局，无论是哥本哈根谈判，还是最近的20国峰会，都没有拿出重大的决定，事实上我们世界所面临的挑战，气候变化以及金融危机的挑战都非常严峻。政府之间的谈判是短视的谈判，只是为了自己国家的狭隘利益讨价还价，或者是简单地承认我们陷入了束手无策中；而事实上我们应该有一个远见，应该共同缔造未来，我们对相互的依存强调应该使我们有一种责任感，超越这种对主权的坚持。

但这如何成为可能呢？我们必须明白社会的这一深切需要，必须认识到相互依存的必要性。同时我们必须建立起友好的关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我们也应该深切地明白我们的命运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应该一起来缔造一个共同的未来。我认为我们的论坛是由两个社会倡导的论坛，是一个自由的对话，没有外交的束缚，因此我们并不是要与政府关系进行竞争，而是希望对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更有益，使其重拾理性与勇气。

我认为我们的论坛与欧盟一样体现了多样性与共同一致性的双重要求。2007年的第二届会议中，我们有46个专题小组，这些专题小组不是毫无关联的，这些小组的结论并不是没有共通性，刚好相反，各个小组的思考中拿出一个非常有利的看法：尽管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有差异，也正是因为我们有差异，我们才要协力面对主要四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战胜价值危机。我们两个社会由于变化迅速，50年来迷失了一些方向，我们必须克服这种价值观念的危机，尤其是当今世界中，经济以及科学的进步还不能够完全给生命带来意义，给社会带来意义；

第二个挑战，要创立一些社会管理的新方式。从地区一直到全球，应该有新的管理方式，在决策方面能够有更多的参与性，而且应该克服传统的行政机构各自为政的做法，复杂的问题需要有综合的解决

办法，管理城市、水源、能源、卫生健康、经济方面都需要这种综合性的做法，需要崭新的方法；

第三个挑战，要实现发展模式的迅速转变。也就是说，从 150 年来工业革命的发展模式转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我们都知道，刚才成先生讲到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他选择这个专题让我觉得很压抑，因为这是大家共同应对的问题，我们必须转型。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是一个崭新的口号，对于欧洲来讲是可持续性发展，虽然提法不一样，但实际上是一样的。虽然已经认识到其必要性，然而如何转型仍需要我们去发现和实现；

第四个挑战，是承担起我们的责任。中国和欧洲是全球重要的行动方，应该是负责任的，应该有一个全球治理的范例，以共同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在 2007 年第二届的论坛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全球治理专题小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中国朋友的谦逊令我感到惊奇。当时有十几位中国的朋友，他们一致告诉我，不要过高地估计中国，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区域大国而已，极力强调中国距离发达国家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过去 3 年当中，中国进步得很快。在金融危机中，中国以其灿烂的文明、庞大的人口和显著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显示了应有的地位。现在我们有责任共同构建新的世界规则，而这一切都尚未起步。

如果说自主权及其不可侵犯性，自从 17 世纪以来，一直是管理国际关系的原则，那么我认为今天相互依存原则应该作为全球治理的指导原则。这个原则应该是有普世标准价值的。将来以相互依存原则为核心来进行体制上的反思和安排。未来世界治理的伦理和政治基础应该是责任和团结。

这个挑战也体现了我们这个论坛应以什么为目标。我们不只是来这里对话，不只是来这里交流经验，而是大胆设想未来，面对挑战。在思维方面我们有所缺乏，在治理思维方面也有所缺乏，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后代负责任，拿出我们的智慧。

自从 80 年代末以来，世界一直由米尔顿·弗里德曼等思想家统治。我们相信市场是自动调整的，而市场平衡是优化的，所以不需要公共行为。可是我们现在确实不能够把市场经济的繁荣果实平等地分配，我们也没有办法管理社会与生物圈的关系，经济效率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并最终导致我们无法预防和解决世界金融危机。这一点让我们反省经济治理中的教条，这些教条把我们困住了。

我非常欣赏中国当局并没有受到这些教条的影响，而且没有陷入这个谜团。中国现在趋向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比计划经济更为有效力。可是中国转向资本主义之时，却恰逢资本主义陷入空前的深刻危机。中国的经济份额那么大，因而无法逃避，跟我们一样要担负世界责任。中国必须立即分析并理解纳入中国的世界资本主义，这对世界来讲、对中国来讲都至关重要。简单地讲，中国必须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凯恩斯之间做一个明确而深刻地选择，就像欧洲一样。正如行动不能没有罗盘一样，治理不能没有一个清晰明确指导原则，世界这台电脑没有软件是不能运行的。而现在，这套软件已经崩溃。不管在座的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也许你们对这两个人不熟悉，不理解我在说什么，这一点真的非常可惜。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用经济术语来寻求正确的思想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的一个生存条件。

问题是我们还有更困难的事情要做。我们必须重建符合 21 世纪的经济思维和政治思维，我认为这是必要做的事情。我深信我们的论坛，凭借我们汇集的精才，凭借他们之间建立起的信任，凭借各小组的杰出工作，我们能够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宏大目标。

大部分规模宏大的论坛都是聆听演说，可是我们第三届论坛应该要进行智力思考。因此明天全天我们要汇集各个小组的思考成果，达成共同认识，来对我们 2007 年所奠定的四个挑战拿出看法。

我们有 600 个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士，大家都来自不同的背景，我深知我们要做的事是一个挑战。但我同时也知道论坛凭借其效率和发展，已经战胜了更为艰难的挑战。

当我们 2005 年在广州南沙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会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对话。当然前面的路还很漫长，但是业已取得的成就让我对未来很有信心。

最后我想说一下全球大局。很遗憾，联合国大会由于成员国众多，差异巨大，是具有多样性的，在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面前已经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影响力和行动力。然而联合国依然是唯一能够产生合法国际决议的机构。随着联合国力量的削弱，一些替代性的机构开始出现，最近的是 20 国集团，但无论如何这还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格局来协调各种不同行动方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与合作。就像我们的论坛

一样，社会与社会之间必须尝试相互对话和共同思考。我们应该将相互依存作为责任的伦理标准。

我们希望在 2012 年举办里约+20 地球首脑会议峰会，以纪念地球峰会诞生 20 周年。

坦言之，现在世界体系是西方大国建立起来的。我们西方人不应该感到羞愧，而是应该感到自豪：这西方对全球文明的贡献。

可是这依然还不够。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中国、印度、巴西的力量在上升，俄罗斯也在觉醒，崭新的世界背景已经形成。在里约+20 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同这些国家一起，建立起一个世界社区必须的伦理基础，组织全世界社会之间的对话，绘制新的世界格局基础。如果我们这个论坛能够为之做出一些贡献，我们能够为建设共同的伦理道德基础做出贡献，如果我们的对话形式能为世界对话提供灵感，那么论坛就实现了其真正的历史价值。

《南方周末》中欧社会论坛系列报道 - 采访罗卡尔（概要）

南方周末：欧元是否还能持续？欧元区会不会解体？面对困局，何去何从？中国应该从中学习什么？

米歇尔·罗卡尔：只有理解了欧洲的历史，才能理解建立欧元的急迫。目前在管理上，欧元并没有形成欧洲层面的统一货币政策，在汇率问题上也不一致，这决定欧元无法承担统一、联合的职能。中国希望资本主义在全球都产生好的作用，但必须要理解它的局限性。资本主义是不稳定的，需要有一种管理者和治理者的思维。

南方周末：在是不是还要继续实行经济刺激政策上，上个月举行的 G20 峰会中发生了分歧，法德等开始退出，但是美国还希望继续，这会对欧洲经济造成什么影响？

米歇尔·罗卡尔：德国总理默克尔说过不管这个事情，因为需要向希腊支付大量的金钱，这可以说是一种地震。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到，欧洲国家之间的团结是不存在的，如果欧洲国家之间没有相互统一的话，弱者就有可能退出这样一个集体。

只有理解了欧洲的历史，才能理解欧洲建立欧元的急迫。战后的欧洲要重新崛起，就必须实现统一，形成欧洲的国家群体，在实体规模上做大。在市场领域，欧洲选择形成一个超国家体制，实现统一的货币——欧元。

但是这存在一个缺陷，各国具有很强的民族独立性，这种民族主义就像一种病毒，侵蚀着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管理上，欧元并没有形成欧洲层面的统一货币政策，在汇率问题上也不一致。这决定欧元无法承担统一、联合的职能。

在中国，广东的贸易平衡不可能有单独的政策，四川也不可能。但联合起来的欧洲跟这不一样，它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为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中欧论坛子云访谈法国前总理罗卡尔： 任何实施自由经济的国家，都必须学会劳资谈判

时间：2010 年 7 月 14 日上午 9 点半

地点：香港九龙富豪大酒店

记者/杨子云

2010 年 7 月 14 日上午 9 点 30 分，出席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的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先生在香港接受了腾讯新闻的专访。记者提问了四个问题，第一个关于社民党的福利国家政策是否降低了法国的国家经济竞争力和人民活力，罗卡尔先生回答，虽然他曾经当过社会党第一书记，但当初所做主要是完备党内制度建设；在任法国总理期间，虽然推进了国家福利政策，但在他任总理期间，实质上是降低了税收比率。第二个问题，记者请教罗卡尔先生，中国当下该如何缓解劳资冲突，罗卡尔先生的建议是：任何实施自由经济的国家，都必须学会让劳资双方有谈判的空间，工人必须要获得满意的薪资，否则社会永不可能安宁。第三个问题，记者提到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在非洲所做投资的批评，问总理先生怎么看。罗卡尔先生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经济实体，需要进行海外投资，这无可厚非，但希望中国不要犯欧洲人在非洲犯过的错误。

第四个问题，记者问到在美国的自由创新和中国的快速发展的夹缝之中，欧洲怎么办？总理先生讲到了欧洲的联合，27个欧盟国家，在经济上是一体的，在政治上是分裂的，这种状况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以下为访谈实录：

“我担任总理期间，降低了法国的税收比率”

记者：米歇尔先生您好，我是来自腾讯新闻的杨子云，很感谢你给腾讯网这个向您提问的机会。你曾经是法国社会党的第一书记，法国社会党执政期间，在承认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比较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法国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目前，有不少人认为中国也应该走这种社民党路线，由国家通过二次分配构建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我的问题是：社会党这种高福利高税收的政策是否降低了法国的经济竞争力和人民活力？



罗卡尔：不要把社会党的主张和我任职总理这两种事情都混在一起。我担任社会党第一书记的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做的事情主要是把社会党内部的章程、制度健全，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所以不是因此就推动社会福利等其他方面的工作。同时，我也曾经是法国总理，在我担任总理期间倒是推动了一些工作，在这个期间，比如说推动了社会福利建设，但是，我并没有因为做社会福利就实施高税收。实际上，在我担任总理期间，我实际上是降低税收比率。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推动的改革是顺利的。特别是，在退休金的问题上，我当时的策略是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退休金的情况，把法国国家退休金的真正状况，全部公布出来，尽可能做到透明，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退休财政状况。通过公开透明来推动退休金制度的改革。

“实施自由经济的国家，必须学会劳资双方的谈判，否则社会不可能安宁”

记者：第二个问题我想回到中国。近30年，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目前面临着劳资关系紧张的困局，经济在告诉发展，但诸多工厂的工人却长期承受着长期加班、低薪水、低福利的工作条件，劳工反抗时有发生。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罗卡尔：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现在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发展道路比较有效益。相对于计划经济来说，这个道路的好处是一目了然的。因为，所谓计划，我们是不可能计划所有的事情，这个地球上这么多事情，我们怎么可以用计划来归纳呢？资本主义制度有一个基本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资本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自由，他可以在任何地方投资，只要那个地方适合于他的发展、适合于他的生存，他就会在那里发展起来，这种自发秩序远远要比计划有效益。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有效益的，这不仅仅指共产主义式计划经济，也包括神权式计划经济，比如说今天的伊朗。

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下的企业家虽然有自由，但他同时也是优先照顾自己的利益，然后才考虑到其他利益。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以19世纪得到很好的证明，冲突、暴力一直没有断过，这其实是制度的特点，确实是很严重，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如果说要寻求解决的办法，对于这种冲突，冲突的双方一定要能够有一个平台来进行谈判，同时双方都不应该采取任何的暴力措施。不管是什么国家，不管实行什么主义，任何国家，只要他进行了自由经济的改革，进入了自由市场经济，他一定必须学会让劳资双方有谈判的空间和可能，否则的话，社会就不可能安宁，工人一定要有他们满意的工资水平。

中国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穷困以后，现在有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可以成为比较富裕的中国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大家都想富裕，富起来以后也都不想分享，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道理，这样可能就会引起社会冲突的普遍化。对于这个问题，同样，双方必须谈判，不能让资方获取赚得的所有财富，也不能让资方获取的分量过大。要有谈判、有协商，只有这样才有解决的办法。我希望中国人能够找到合适的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在非洲，不要犯我们欧洲人曾经犯的错误”

记者：非常感谢。我的第三个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到海外寻求资源和财富，必然会到海外进行投资，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海外投资，诟病较多，尤其是指责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说中国在非洲是新殖民，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罗卡尔：中国对海外投资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因为各个国家都会对外投资，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这么大，经济力量正在快速增长，向海外投资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这个行为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很多时候，有些国家对外投资和扩张的

时候，因为力量比较大，实力比较强大，也就陶醉于自己的实力，结果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这样的情况经常指的是美国。

非洲大陆有着很痛苦的历史，与中国相比，非洲的历史更加沉重、更加痛苦。历史上，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曾经受到殖民的侵略，现阶段，又没有能够成功地进行现代化转型，到现在，非洲的经济还没有能够起飞。在这这样的状况下，非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和中国有相同的地方，因为非洲受到过灾难，也承受过西方侵略引起的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是热爱中国的，所以我希望中国在非洲投资以及在与非洲交往过程中，不要犯我们欧洲人曾经犯过的错误。

经济联盟与政治分裂的欧洲

记者：总理先生，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欧洲。在美国的自由、创新，中国的低成本发展的夹缝之中，欧洲怎么办？

罗卡尔：欧洲的情况是很特殊的，自从欧洲联盟建设进程启动之后，欧洲慢慢地走向主权分享的过程，这个主权分享，是指27个欧盟国家把自己的主权一部分交出来，交给一个共同的机构，这样的分享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欧盟的成功主要是在经济和财政方面，现在欧洲才有了统一的货币欧元，这些都是令人十分欣喜的进展。

但是，相对来说，欧盟在政治建设上突破并不是很大，现在没有共同的外交和共同的国防。欧洲有5亿4千万人，这是世界上非常大的一个经济体，如果是在商业的谈判当中，欧盟其实是一个单独的、独立的谈判角色，欧盟的力量实际上是很大的，欧盟的市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是欧洲的政治情况就不一样，只要一谈到政治，欧洲就是分裂的，各个欧洲大国各自为政，包括英国、法国、波兰等等都是这样的。

这样一种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况，恐怕还会持续下去。对欧洲来说，也只能是这样的。因为主权国家对政治联合的抵抗太强烈，欧洲政治方面的联合，有可能走不下去。

记者：谢谢总理先生，谢谢我们今天的翻译陈彦先生。

嘉宾简介：

罗卡尔（Michel Rocard，1930—）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之一，西方“民主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法国政府总理。1930年8月23日生于法国上塞纳省库尔帕瓦市一知识分子家庭。先后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巴黎大学和国立行政学校。曾任过财政督察、财政部专员和经济预算处长、全国经济预算审计委员会秘书长等。1949年开始从事政治活动。1955—1956年任社会党所属社会主义大学生协会全国书记。1958年创建独立社会党（1960年改称统一社会党），1967—1973年任该党全国书记。1969年起（除1973年落选外），连续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74年加入社会党，次年当选为该党中央指导委员会和执行局成员，随后又进入该党全国书记处。1977年任伊夫林省贡弗朗——圣——霍诺林市市长。1981—1985年在社会党政府中先后任计划与领土整治国务部长和农业部长。1988年密特朗当选总统后，1988—1991年被任命为政府总理。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法国政党》、《统一社会党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思考》、《共同市场反对欧洲》、《讲真话》及《罗卡尔言论集》等。

米歇尔·罗卡尔接受奥一网采访



法国前总理罗卡尔（右）在翻阅奥一网宣传册，多次访华的罗卡尔对中国广东有深刻印象。特派记者姜丽萍 摄

米歇尔·罗卡尔，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之一、欧洲议会议员，尽管已卸任法国总理多年，但他仍活跃在法国、欧洲政治舞台，多次访华的他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1992年访华时，当时法国外交部给他准备了文件，他看到中国广东省的资料，“当时广东省人口6000万，和整个法国的人口数差不多，但那时广东省保持了17%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我说，17%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它是个错别字，可能是1.7%吧。到中国后，在从深圳到香港的高速公路上，我看到全部是卡车，把路塞满了，我的车队被挤到一边——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发现中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这让我想到了邓小平起到的作用”。10多年过去了，他对中国、广东又有什么新的认识，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欧洲在世界治理格局中，又各自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外交摩擦在这位资深政治家看来又意味着什么……

23日下午，在法兰西学院，罗卡尔坐在了中国记者的面前。

“不因外交摩擦停止交流”

记者(以下简称“记”)：今天上午，我看到有一个网友说：我现在对法国印象不好了，我不想再对法国提问了。虽然这只是极少数网友，但是我知道他这么说是因为近年来中法外交的摩擦不断所引起的反应。您认为中法之间摩擦不断的根源在哪里？未来中法关系的走向如何？

罗卡尔(以下简称“答”)：外交摩擦不要看得非常严重，这是一种很平常的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开始影响世界的年代比欧洲要早，中国有四大发明。后来有一个中国皇帝说：外国人很恐怖，要切断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如果有人造船可能被判处死刑(编者注：指明朝实行的海禁政策)。这种情况持续了500年，这也使得欧洲和中国的联系切断了500年，两者之间越来越不熟悉。通过殖民战争，中欧再次相互认识。当然战争不是好事。

当然，现在世界的形势是朝向和平的方向发展，核战争不可能发生。世界各族人民坐在一起，为全球治理贡献力量。因此，也需要不同的人坐在一起交流，但实际还存在很多相互不了解的情况。对于什么是价值，怎么建构价值就可能存在不同的观点。这种误解就可能是导致摩擦的原因，今后也许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摩擦出现。不管是哪国人，都不能因外交摩擦而停止相互的交流 and 理解。

我们论坛的目的就是促进中欧双方的相互了解。作为外交人士，从职业要求来说不可能说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双方都不可能做让步。这样就使问题无法得以解决。中欧社会论坛则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去分析，我们的差异是不是大到无法弥合。

我可以开一个玩笑：外交家自己争斗去，不要给我们造成伤害就好。我也希望通过交流建构起更好的双边关系。

记：你如何评价现任萨科齐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就你看来，中欧的分歧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我现在已不是总理，我是反对党，我不代表政府。对于现任法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我不是根本上反对，但是我认为它很短视。我看到美法之间的关系借助奥巴马的访问得到很大改善，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而我们中欧贸易开展得很好，而且双边是和平的关系。中国取得的进步，也让欧洲感到震惊和惊讶。在核能领域，中法有很好的合作关系，现在中国又是一个航天发展的大国。

中法之间的关系，不应该只在外交层面上来看，还应当通过贸易等领域的合作，使得双边关系从更好的方向发展。

金融危机深刻影响着全球，西方国家遭受非常大的损害。最近这几个星期，情况有所改善，但是经济增长率还是很慢。金融危机对民众造成的影响很大，工作不稳定、工资下降、生活更加不确定、变得更加贫困。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存在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北美、欧洲。那么，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中国可能也认识到这一点。作为资本主义，它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稳定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问题。1975年经济危机以后，再也没出现过去高速增长的情况。失业率、不稳定因素到处都存在，没有人知道这该怎么解决。

要改变现状的话，要先改变现有资本主义的规则。并不是完全靠计划经济、行政手段，而是要有一定的管制。中国的经验是开始引入资本主义的做法，减少政府干预的行为。欧洲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体系会更加困难。要想解决目前的金融危机，中欧应该更好地坐在一起。

欧洲统一行动面临困难

问：中欧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你的具体建议是什么？

答：第一，我非常赞同中国政府提出的，现有美元作为单一国际货币的现状应该改变。中国的提议是非常有眼光的。第二，在方法上，中欧双方应该进行思考，真正建立世界框架内的新金融体系。中欧

间应该尽快达成一致意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监督机制，对世界金融情况进行跟踪和监督，并使美国接受它。金融衍生产品是特别危险的，它是对未来金融的交易，而不是现实财富，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金融衍生品也可能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对金融秩序的监督应在这个范畴内理解。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具体的表示。最好的做法是欧洲努力推动欧元的发展，法国开始接受这一点，当然这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接受，尽管我说到要统一行动，但是要明白一个事实：欧盟这个机构没有足够大的权力、欧盟现任领导人也没有魄力、也不够果敢来实现这一设想。

“权力变化应对社会变迁”

问：广东省珠三角的九个城市正在推进一体化建设，避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等弊端，统一调配公共资源。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在推进城市圈建设。从欧盟建设的经验出发，请你谈谈对中国城市圈建设的建议和看法。

答：我到过广东，广东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于你们的一体化建设，我暂时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建议，因为欧盟建设也是只走过了非常短的时期，国家之间成立联盟，制定共同的货币金融政策等，使得国家联合在一起。作为欧洲城市的发展，包括法国在内，中央政府把很多的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地方市政府有很大的权力。中国和法国可能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权力的变化如何应对社会的变迁。在巴黎地区有 1200 万人口，大致占法国总人口的 1/6。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市政工程等相匹配的建设。有 1300 个城镇都属于大巴黎地区，如何使这些城镇按同一个方向发展也是很困难的。我想中国的珠三角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本报特派记者 蓝云 姜丽萍

➤ 2007 年：第二届中欧社会论坛



2007 年 10 月 6 日法国前总理、中欧论坛创始人米歇尔·罗卡尔出席在布鲁塞尔举办的第二届中欧社会论坛，并在全体大会上发言。全文如下：

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国与古埃及大约在同一个时代诞生，拥有着六千年延续不断历史和文明，令人由衷赞叹。中国人在欧洲人之前发明了纸、指南针、船舵以及火药等工具。早在葡萄牙航海家恩里克王子在位的年代，欧洲航海家们就经常在环游非洲的途中遇见中国帆船。中国在欧洲之前就已踏上引领世界的征途。然而到了 15 世纪，某位神秘的中国皇帝认为与欧洲蛮夷的交往会玷污中国人民的精神与文化。于是皇帝颁布诏书，禁止并惩罚一切建造航船的活动及出海远航的计划，违令者会被处以极刑。由此，中国沉睡了五个世纪之久。长达五个世纪，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没有参与到世界人类史进程中。而那时中国的生产总值也仅占世界的 1%，贸易额占世界的 0.5%；久而久之，中国被淡忘了。但世界各地仍不乏惧怕中国的人。历史教科书里、人们谈话间仍残留着“黄祸”这样的字眼，而不久后，这个词就单用来形容日本人了。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天，中国的苏醒令人震撼，在我看来，这是今日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推行多项重大改革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回升到了约 8%、9%，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也达到了同样高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欧洲、美国的三倍。用不了二十年，中国在世界生产总值和国际贸易中的份量将跃升到 20%到 25%。我们将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中国特别强调，中国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崛起，以和平的方式重返世界经济舞台。这种态度是理智的。的确，在其漫长的历史上，中国未曾侵略过任何国家。西藏和越南或许是例外，但这些地区于中国好比阿尔萨斯和洛林对法国一样关键。而中国自身则自经历了无数次大规模的侵略。我们了解这些历史，却仍对中国感到恐惧。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疆域辽阔；其次，中国有能力迅速掌握尖端科技，最近中国在航天领域的新进展是众所周知的；最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可能正在威胁欧洲的就业局势。中国土地辽阔，历史文化悠远，在当今世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

在座的各位一样，我真切地希望，中国的再度腾飞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我曾经担任过法国总理，经验告诉我，在世界任何地区，无论涉及哪方面的问题，讲和平、讲协商远比搞战争、搞冲突更复杂、更艰难，需要更多的智慧。总理的经验还让我认识到，民族间的矛盾并不仅仅涉及到各国部长与元首，更是由各国人民酝酿的。中东今天之所以上演民族冲突的惨剧，恰是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大多数人都拒绝为争取和平做出象征性的让步。所以说，中国的崛起在相互理解的前提下的进行，欧洲给予中国振兴的空间，乃至中国接受发展过程中某些行业上的条件及期限等等也不一定能够一帆风顺：论坛的创立者们恰恰意识到了这一点。一系列论坛的展开是由欧洲的中国教授们联合发起的。他们迅速与人类进步基金会建立了联系，并且展开了一项规模极其庞大的工程：他们创立的志愿者联络网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获得了惊人的成绩。今天距第一届南沙中欧论坛已经过去两年了。我有幸获邀参加了南沙的论坛。那是一次珍贵的经历。在南沙，欧洲各国人民的代表和中国人民的代表第一次在不受任何监控，也不承担任何政府层面上的责任的情况下举行了广泛的会晤。从根本上说，高校及科研机构之间的沟通实现了中欧两地的公民社会的交流。这种交流形式丝毫不意味着对政府机构的不信任。两方的政府刚才也对此表示了认同。中国和欧洲的官方代表今天亲自来论坛上对交流进程给予支持。我们认识到，无论是欧洲政府还是中国政府在处理很多问题、尤其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常感到无助。棘手问题出现时，否决另一方似乎更轻而易举。甚至还有人要投票确立类似的口号，敌视是一种可怕的态度。我们今天所在的比利时就正经历着民族矛盾。中欧两方的政府都意识到两地的知识分子、专家、教授、学者、科研人员、政治学家之间的交流是相当紧迫的，切实有必要扩大相互了解和理解，增强对对方问题的认识。说到这里，我联想到了世界治理讨论组中方的开幕词（我在此表示我对吴建民大使的诚挚友谊，我本应和大使共同领导这个讨论组的工作，遗憾的是大使没能到会，于是我独自负责了该讨论组的工作）。中方与会者对我们说：“不要高估中国的份量，中国算不上国际强国，只能算地区性强国。”欧方代表们为此感到很惊奇，中方或许过于谦虚了。我们回答说：尽管贵国如此看待这个问题，但是，无论是全球变暖、美国棘手的财政赤字问题、争取和平的斗争还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都需要全球做出迅速的行动，中国朋友们也必然参与其中。的确，时间是循序渐进的，现在尚不是为各讨论组做总结的时候，总结要在明天进行。关于我参加的讨论组，我还希望补充最后一点：我们比上一届南沙论坛时进行了更有效、更开放的对话。你们会说，我们的确有开展这种形式的交流，因为两方的相互了解还很少。此外，某些历史原因造成双方都心存戒备。正因为如此，今天的沟通更令人振奋。我们发现，双方拥有很多共同尺度、共同理想，如在解决独立的国家主权和必要国际规范的确立之间的矛盾这一方面。欧洲人之间曾相互争辩了很久，如今已经感到疲倦了。最近这些年，中国也越发咄咄逼人，不夸张地说，先前我们欧洲人之间的争吵还要更加激烈。如今，争吵过后疲倦了的欧洲人认识到，世界有必要确立国际规范，进行更完善、更合理的治理。我这里并不是指需要建立世界政府：世界治理可以通过合约、程序、法庭和有实际效力的法规条文等多种方式展开。这类进展是世界所迫切需求的。贵国坚信，各民族对自身力量和尊严的发掘是一切的前提。我们万不能忽视这一点，共同探讨这个问题是一项了不起的举措。首先，必须清楚，欧洲和中国的会晤并不是一种抵触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行动。恰恰相反，中欧的交流只是国际治理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之后我们还要与美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多个国家继续这一进程。其二，同样的道理，即便是大国也不可能独立解决世界问题，例如中国或是已经在经济和金融领域获得了国家层级权力的欧洲。世界问题的新形式迫使世界各国共同对治理进行思考。各国都在这方面不断发现和摸索，携手共进，展开认知过程。这一点在我看来是至关重要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为我所参加的讨论组的成功进行感到欣慰，我高兴得看到，讨论顺应了某种需求。想必其它四十五个讨论组也不例外。如果明天，双方在此决定交流进程应当继续，那么我们将在第二届中欧论坛之后举办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中欧论坛，一届一届地扩大论坛的规模。我们将矢志不渝地促进世界大国之间的了解，为世界未来的和谐与和平做出贡献。这一过程会相当艰难，也因此而更加意义深刻。谢谢！

2007年10月5日《高端访谈》节目主持人水均益专访法国前总理罗卡尔

鉴于罗卡尔先生也是中欧论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主持人在采访开始的时候首先围绕两届中欧论坛

的举办来展开，包括两届论坛举办的社会环境的不同，围绕的议题不同等等；随后，罗卡尔在欧洲的联合和世界治理模式上，畅谈了自己的感想。



摘要：

“组织这样一个论坛是为了让双方能够对彼此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同时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从某一角度来说，是为了世界的共同利益。我们要在人们的头脑中构建一种和平，让双方对彼此都有很好的了解。了解双方的历史，双方面临的种种阻碍，这种了解可以构建友谊，让大家成为合作伙伴，成为朋友。

第一届中欧论坛的巨大成功并不是因为它的召开，而在它的召开之后，人们决定还要召开第二届论坛。我们认为，每两年举办一次这样的论坛、并吸引更多人的参与将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针对欧洲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问题，罗卡尔回答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联合国有 192 个成员国，其中一半的国家，也许大家都不认识，但是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每个国家都对中国的文化赞不绝口，每个人都听说过北京的紫禁城，所以大家都非常尊重中国。邓小平先生的理论让中国得到了统一，让人们对中国的尊敬与日俱增，恢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尊严。但是对我来说，至少中国还有很多贫穷的地方，另外一个元素是，欧洲的一些公司关闭了，有的成为中国公司的服务加工厂，为的就是赚一些蝇头小利，因为每个欧洲人身上都穿着中国制造的衬衫和体恤，手上拿着中国制造的移动电话。这些导致了欧洲国家的失业率。为什么不呢？这就是中国的进步。中国人的工作机会多了，一些欧洲人失业了，所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新的工作机会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但这些事情是需要协商的，要非常小心地处理。如果这种势头发展迅猛，再加上语言上的威胁，那么我们会时刻面临艰难的谈判，如果欧洲的失业率继续增长，那么我们也许就会感到担心，所以这些就是为什么中国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和欧洲进行谈判的原因，我们要了解对方，发现对方，这样就能打破这种威胁。

人民网：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谈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



10月5日，正在比利时出席第二届中欧论坛的法国前总理、法国社会党前总书记米歇尔·罗卡尔先生远程做客强国论坛，就“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同网友交流。

访谈摘录：

网友 1：您是中欧论坛的创始人，为什么中欧论坛是一个组织和一个国家的对话，这种交流的意义在哪里？

米歇尔·罗卡尔：首先要说一下欧洲联盟，它包括了众多国家，众多国家间从历史角度看，一直战争不多，二战中，欧洲有四千多万人死亡。二战结束后，欧洲对这种状况无法忍受了。这也就是为什么 50 年来欧洲国家一直努力建设欧洲联盟这个机构。欧盟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工作不太涉及政治方面和安全方面，国家安全问题仍然在北约的框架下协调。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讲，欧盟已经一体化发展到很深的程度，贸易政策已经一体化了，欧盟成员国里有一半已经统一了货币。目前为止，由 27 个国家组成的欧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联合体。所以欧洲联盟在世界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中国来讲，我们认为中国了解欧盟的工作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中欧论坛很重要。

网友 2：现存国际制度在治理全球问题过程中面临哪些问题？

米歇尔·罗卡尔：联合国改革问题，最大的两个挑战，第一个是安理会的改革。在安理会的扩大上，除了接受德国和日本以外，还应该接受发展中国家成员，比如印度和巴西。也有人提出非洲国家应该有代表。当然将要进入的国家和不能进入的国家之间比较有艰难的谈判。第二问题，是关于否决权的问题。从 1946 年，就一直存在一个问题，有些国家过渡使用他们的否决权，影响了联合国运作的有效性。当然世界上比较大的国家的权利我们是无法改变的。

网友 3：中欧在谈全球治理，美国人认可吗？

米歇尔·罗卡尔：很大程度上是认可的。我们对美国政府还是比较了解的，经常见面。近年来，美

国对自己在全球社会中担任的角色，在认识上有了一些改变。美国需要欧洲帮助她解决一些中东问题。美国正面临着一个任期将要结束的政府。美国当时抛弃了多极化，试图减弱联合国的作用，在全球单独强调美国的利益，尤其在气候方面尤为明显。美国推行的工具是武力和军队，而大多美国人是反对战争的，大家希望民主党能够改变这种状况，此外美国政府也明白了他们的军队是不够用的，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队撤不出来。美国现在开始寻找多极的可能性对话，他们看了我们的工作都明白，美国会和欧洲就所面临的问题一个个的讨论。

➤ 2005年10月：第一届中欧社会论坛

中欧社会论坛的理由和雄心

米歇尔·罗卡尔（中欧论坛创始人、法国前总理及欧洲议员）

在亚洲地区，特别是亚洲的中国，凭借其人口大国特点和自身的巨大变革，已经在经济活动和世界贸易当中重新取得了重要的地位。

这场巨大而进步的变革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它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例如出口增长迅速，这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迅速得到提高。

此外，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发展同世界其它国家间关系的过程当中，重新取得了平衡。这还是新的、重要的一点。

最后，这也意味着中国将要在世界上逐步取得首先是贸易、其次是金融、政治、外交方面等等，那些至今我们还无法充分想象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项变革是极为困难的。就如同我们所期望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宣告的那样，它需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然而，要知道，这种平稳顺利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或是天意安排的。

存在着不断的、甚至是严重的利益冲突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彼此间了解还不够深刻，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容易从互不了解到产生偏见，再从偏见发展到矛盾冲突。此外，不容忘记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金融世界当中，全球化进程尚未完全走上正轨，更有甚的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常常被迅速严重的不平等化，系统的不稳定性和由其带来的就业的不稳定所抵消。**

这些影响使人们感到害怕。全球化的这些不良影响部分地解释了荷兰人民和法国人民为什么对欧洲建设法案持否定态度。同时也解释了伊斯兰教人民在他们长期屈辱的历史过程中，看不到一种更好的生存方式在他们的国家被确立的希望。这种失望的情绪不能说与恐怖主义的滋生无关。但就是这样一个世界构成了我们今天和明天全部的日常生活。

两个巨大的重要的经济、金融实体——中国和欧洲——都为世界的和平与对和平的追寻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们不应冒险眼看着金融和贸易方面的不稳定，转化为威胁双边相互理解与相互友谊的因素。我们清楚地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经济危机而爆发的。

所有的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加深相互了解，彼此开放，在二者之间创造一个真正的伙伴同盟关系来理解差异，彻底消除彼此间的误解与隔阂，将此次会议转变为一种深化双方新型合作关系的契机，继续扩大多种沟通渠道，跨越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鸿沟。

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多次的会面和深厚的友谊。

建设一个和谐、平稳发展的世界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这就是我们今天相会在这里，举办这次盛大的中欧论坛所要谈论的话题。二十一世纪只要我们同心协力，世界必将能够呈现出一个尚未开始的和谐局面！

世界的治理可否参考欧盟建设？

米歇尔·罗卡尔（中欧论坛创始人、法国前总理及欧洲议员）

现在讨论的这个主题难度很大，世界的管理可否参考欧盟建设？我的答案是“大概可以吧”。为什么

我相信如此？现在的欧盟是一个意愿的整体，由 25 个国家共同实现经济的发展，现在欧盟的生产总值已经可以和美国相比，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实体。如此巨大的一个经济实体，是历史上第一次通过非暴力方式建立起来，以一种共同体形式存在的。然而最开始的初衷并不是建立一个经济实体，而是试图在不同的西欧国家之间、特别是连续了七八百年战争的法德间，创造一种机制，使这样的战争不再可能。我们曾经希望**通过一种机制来制止战争。注意，并不是想创造友谊，而是要制止战争**，这是我们的初衷。这个最早想法出现在 1947 年，50 年代开始进行，1951 年《罗马条约》签订，标志欧洲煤炭钢铁联营的建立，它使法德两国避免出现庞大的国家战争机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意大利等其他国家看到这一点，也决定加入这个机制，那并非是要强调一种欧洲联邦的形式，而是能够参与煤炭和钢铁的联营。

当时这一进程非常顺利，但历史证明是不够的。当时法国产生了第二个想法——法国是欧盟建设思想的最大生产者，从而也是一个破坏者——就是把军队统一起来。冷战其时已经开始，大家都害怕苏联，这个想法于是得到另外五个国家的支持，包括美国的支持。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美国如此大的支持，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国人想利用西方共同对抗苏联。但是当时欧洲各国没有统一的外交政策，这一想法不合逻辑也不现实，为时尚早。特别是刚刚经历战争就给德国士兵重新武装，大家觉得太早了。法国否决了这项提议，后来我们再没提过。欧洲现在给人们的形象也得归功于 1954 年这个关键的年份，我们决定互相开放边境实行共同关税，取消所有内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成为一个外部统一关税的边境。50 年代中期，条约谈判进展很快，罗马条约签订后不久即于 1959 年开始实施，六缔约国就此产生。事先我们没料到这会是一个如此强大的经济推动器，一个经济增长的杠杆。15 年之后，6 个缔约国的经济增长比世界平均水平要多一倍，而且其中每个成员国的对外贸易也增长了 1.5 倍，这是非常惊人的，西欧因此得以拉平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70 年代末期，增长速度非常快，超出人们的设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法国人和德国人开始相互有了好感**，就像日本人和韩国人在经济的重新繁荣中和解一样。但当时的机构还很脆弱，决定由部长会议定夺，还没有很好的运行工具。欧洲议会也没有立法的主动权，最开始只是一个咨询性机构。欧洲委员会是欧洲的立法机构，但它只能做出新的提议和决定，而对已有规定没有决策权和发言权。另外欧委会通常采取全体一致通过的标准。欧盟进程至今一共有八个条约，从一个条约到另一个条约，我们看到欧洲议会在不断壮大，在税收方面政策还需尽可能地加强，在社会事务尤其是对外政策等方面也要扩大权力。四十五年来，我们还没有能够协调好税收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关系。

四十五年很漫长，从内部来看，欧洲是一个很大的家庭，可以说大得有些笨重了，很难推动其产生变化。它暂且只能很好地实行其共同贸易政策和保护竞争的政策，而我们的美国朋友还有反垄断的政策。欧洲的内部市场用一些标准、贸易原则、商务行为等政策进行了很好的协调，这个内部市场运转良好。在欧共体建设中，一般人尤其是年轻人更关心钱的问题，而不再是人类的痛苦。戴高乐说欧洲的事务是过时的事务，但它的进程是强有力的。可以说这是一个富国俱乐部，他们聚集在一起以便更好地组织，保护自己来反对别人。

然而从外部来看这个整体，就是另一回事了，所有的邻国都希望加入这个俱乐部，而英国曾有十年时间一直想着破坏欧共体，当德国、丹麦等其他国家都加入欧盟，它才没了别的选择。希腊在经历专制过后，疯狂地想拿自己的经济作赌注，以响应人民对民主的诉求，进入欧共体这样一种系统，我们同意希腊加入了这个整体。西班牙、葡萄牙也相继加入，佛朗哥死了，专制者死了，人们想重新找回民主制度。从经济上来说，这是一种近于疯狂的举动，法国和德国太强大了。赌注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混合了政治因素。在铁幕落下之后，共产主义在欧洲崩溃，瑞典、芬兰、奥地利三国迫于邻国的强大所构成的威胁，也立刻申请加入欧共体。一旦内部共产主义消亡之后，中欧国家还有巴尔干国家，如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都要求加入。我们没有一个标准，也没有一个书面的协议规定哪个国家可以加入哪个不可以加入，因为他们是坏欧洲人。最终大家都加入了，这非常好。但是在这此过程中，世界的战略安全是由美国保障的，是美国而不是欧洲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因此大部分欧洲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都不希望与美国产生敌意，而唯一的方式就是压根不要有自己的对外政策。四十五年来，也正因为此，我们从来没有成功地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一致行动。例如在伊拉克问题上，你就看到欧洲没有共同对外政策，这并不令人惊讶，我想中国政府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欧洲现在所拥有的统一军事力量只是用于某些人道主义干预，而且是在北大西洋公约之外的。仅仅是在中东、以色列、巴基斯坦等问题上，欧洲开始用同一个声音讲话，并制定统一的政策，但是由于我们仍没有能力进行干预，这些使命还远未完成。但一切都将发生变化。以上是对整个欧盟的历史的概括。

你们可能还想问，欧盟对世界的治理是否有帮助？我想是的，理由有很多，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首先是令人惊讶的和解。1945 年还相互仇视的法国和德国现在联姻了，在各个国家中，如果做一个公民调查：如果你不在这里生活，你将更喜欢在哪个国家生活？在法国和德国，即使跨国婚姻并不多，法国人也会首先选择德国，而德国人会选择法国。两国的城市纷纷结为友好城市，企业之间相互参股。150 年以来冲突不断的天主教徒和爱尔兰新教教徒，现在也在走朝向和平的进程。而波兰人和德国人之间，现在才达到了真正严肃的和解。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经过了 9 个世纪的仇恨和战争，各自为营，相互交仗，和解的意义多么珍贵，而欧盟的形成最终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时我也赞成土耳其加入欧盟，否则我怕很难看到土耳其能够承认希腊的塞浦路斯共和国。

其次，欧洲还发展了一种内部的团结互助精神，一种经济上的团结，帮助比较贫穷的、不够发达的成员国达到共同的富裕水平。比如西班牙对葡萄牙的帮助，现在葡萄牙比西班牙好要富裕。而希腊则更加受益，更要特别提到的是爱尔兰，加入欧盟的时候它是最贫穷的国家，而现在已经成为位列第二或第三的最富裕的国家，进步极其明显。所有东欧的国家加入之后，都可以享受到欧盟体制的帮助。现在还有五个国家等待加入：保加利亚、土耳其、乌克兰、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可以说这是我们二十一世纪即将经历的最大冒险。欧盟是一个非常强大、有益的工具，用来调整欧洲发展的不平衡，对世界的治理做出有用的贡献。

第三，欧盟政府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产生政治决议的机构，在不同的国家中做出不同的决策。谈判是一种技术，而且是非常困难的技术。我也观察到，有一些个人或政治力量，国家、民族，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认为自己很强大，但非常不重视谈判的能力与才智。在欧洲，任何人单独行动都是没有力量的，所以我们必须协商解决卢森堡不愿接受的资本问题以及希腊的税收问题，**谈判就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这样的谈判能力是非常有益的，对于我们管理世界的公共事物也非常重要。当然，它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因为我们所生活的当今世界，武力的局限性在增加，许多情况下使用大棒政策是不会奏效的。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友好地协商，减少相互之间的不愉快。布什总统其实也该听取欧洲国家的一些建议。我们并不是处于反美的立场上，当然确实有一些反美人士，但他们是少数，我们并不反美，只是希望提醒布什总统要警惕，在伊拉克使用武力只可能让人民更加反对你。我们并不反美，而是出于社会角度进行考虑。谈判是一种软权力，在伊朗问题上也是同样的情况，面对它使用核武器的要求和愿望，欧洲人都一致认为使用武力是不能取得任何效果的，而且可能会有危险，同亚洲人的想法一样，当然这要由你们自己来表态。欧共体已经开始启动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开始时布什总统总是谴责我们，说你们干什么呢，这是美国人的事情。之后一些美国机构却发现这是一块对美国军队来说难以消化的东西，因为伊朗比伊拉克大三倍，而且国家意志更强，美国人无能为力。他们应该寄希望于欧洲人而不是去攻打伊朗。这也是布什总统现在的想法，所以他很聪明，他改变了自己，虽然谈判现在还处于僵局，但很多人都希望这样的谈判继续进行。

同样在中东，多年以来，欧洲就在支持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总体地推进那里的民主进程和选举制度，帮助开发那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欧盟的形成是从共同管理煤钢资源开始的，同样地，在那个地方是从水开始。大家没有选择，在那个地方如果用武力就永远不能建立和平。现在我们都懂得了仅用武力是永远也不能建设和平的。谈判才更加有用和有效。我们通过了《七十七国条约》，和非洲的一些国家达成协议。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重视谈判，只是使用武力去推行人道主义，现在欧洲的谈判天赋发挥出来，使全世界刮目相看，它使欧洲处于和平之中。谈判的作用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不再要使用武器，除了采取一些军事措施。我想谈判的应用范围会越来越广，解决当今一些世界性问题，仅通过武力是不可能的，是没有效率的，我们应当承认这一点。软权力的时代已经来临，也就是法律的时代、谈判的时代和相互理解的时代已经来临。

还有比这更紧急的事情，就是在二十世纪的对抗中，并非管理经济赢得了胜利。不仅北美和整个欧洲，而且很多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俄罗斯还有中国，他们都通过和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原则，保证市场经济的运转。市场经济可以帮助我们确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但它却不能完全规定所有的社会机制。我们还要明确企业的所有者，不论是公共的、合资的、联营的或国有的企业，以及国家的作用。国家是一个很大的生产者和机制的调控者，或者它不参与市场经济，只是负责警察、外交和军队，这是一个很现代的观念，这些都是有待思考的问题。

当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结合的时候，就是资本主义，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存在，我们当初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自 30 年代以来，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形态。在冷战开始时和冷战之初，欧盟建设刚刚起步，当时资本主义处于恒久不稳定的状态，当我们通过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把社会 1/3 的收入用于建立社会保障系统，建立高工资制度，它的那种不稳定状态被纠正了，我们成功地促进了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这改正了资本主义的弱点，提高了人们消费的数量和质量。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做法，即通过加强国家对财政管理政策和货币管理政策的干预，其时成效卓著。**从 1945 年到 1975 年，欧洲经济持续三十年繁荣，没有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而不平等现象不仅没有加重，在法国和英国还有所缓解。**到 70 年代末，资本主义已经如此强大，以至于大型企业超出国界并且超越了所有规则，因为在世界范围内劳动力的生产已经不再有任何规则，于是产生了新的经济理论——货币主义，也就是美国的弗里德曼的理论。它宣扬市场的平衡是可能存在的最好的管理方式，尽量避免国家干预，甚至是对减少失业、解决不平等问题干预，因为国家的干预只能使问题更严重。它更倾向于提高利润而不是提高工资，强调收入的不同分配。一些保守国家，像美、日、英等主要的发达国家都采用了这样的理论，包括世界银行等经济实体，这一理论已经主导了世界。

各位中国朋友，你们在开放当中，并且在国内给予市场经济以重要的地位。你们知道，在你们周围，资本主义正在变得更加残酷，从 80 年代以来，贫穷在发达国家有所发展，同样富人也在增长，财政是不平衡、不稳定的。97 年金融危机震荡亚洲，导致汇率下降，美洲和一半以上的拉丁美洲国家也都在朝着这一

状况发展并陷入一种非常痛苦的境地。差不多所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都在变得日益脆弱。国家不再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新奥尔良的堤坝没有被修复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足够富裕才可以保障自己，因为国家没有钱。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残酷阶段，但它并不是命中注定的，我们在 40 年以前就已经采用过最好的调控政策。

中国面临选择，问题在于，你们是否要一个经济发展平衡的、和谐的、有调控能力的国家。你们有悠久的历史供你们借鉴来做出这样的选择。选择一个更加活跃、更加资本化的模式，也许是有效的，但却是不稳定的和残酷的。你们的选择非常沉重，因为不可能以武力来决定这一切。我们原有的世界已经结束了，已经没有疆土可以去征服，和平是不可能通过军事力量的外在干预实现的。在我们确定和加强有效的、经济的和人性的管理机制的时候，中国将会看到并不是武力在制造强大和和谐。而欧洲对中国来说，是可供借鉴的最重要的且有益的存在。管理世界要通过一系列的机制，要加强调控的能力，减少贫困，建设和平。也许在这之后，由于我们不使用武力，我们不会让任何人害怕。我想这样的方式会更好服务于世界。

现在请我们的中国朋友做出他们的选择，谢谢！

讨论环节

米歇尔·罗卡尔（中欧论坛创始人、法国前总理及欧洲议员）

亚洲尤其是中国，正在世界经济与贸易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与他们巨大的人口数目是相适应的，这本身就是一场大革命。经济上中国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改善，这也意味着她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重新找到了一个平衡；同时也意味继贸易之后，中国将在金融、外交政治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其重要程度目前无人能够想象。然而这种变化是最艰巨的，最好以和平方式进行，正如中国政府所宣称的那样。但和平发展并不会自动出现，它必将引发频繁并且深刻的利益冲突。由于人民之间的缺乏了解，无知常常导致怀疑甚至冲突。当今世界，金融状况还不稳定，无法对全球化进行很好的调控，因此全球化带来的益处无时不受到其所带来的不平等加剧而消解。正如 97 年亚洲金融风暴给人民带来的恐惧。今天的生活可以说存在过多的恐惧。它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欧洲有些人拒绝欧洲宪法草案？出于对未来的恐惧，法国和荷兰对欧洲宪法说了不。同时，不受控制的全球化也影响了第三世界，比如一些在历史上遭受蹂躏的伊斯兰国家，全球化下他们看不到希望，而绝望滋生恐怖主义。但是目前中国显然到处充满未来会更好的希望。

我希望双方促进相互了解，交流智慧，逐渐消除和减少中欧间的分歧、误解，不断构建新的合作，在彼此间搭建更多的桥梁，使我们得以跨越将各自分隔的文化差异。中欧文化论坛正是这样一座桥梁。为建起其他更多桥梁，需要时间和双方的努力，需要经常会面和交流，才能建立更多的友谊。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不容易，也不是必然的，也许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大胆的、或许有些疯狂的想法来改变世界。我预祝首届论坛成功并希望它长期办下去，成为 21 世纪一个更加和谐社会构建的开始。谢谢！

评议环节

米歇尔·罗卡尔（中欧论坛创始人、法国前总理及欧洲议员）

我非常欣赏吴大使。他的提问其实很幽默，他真的非常出色。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能足够精确和有高度地回答。我想也许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准备好给你的答案，我答应你。现在我只能即席就你的三个问题随便做一些回答。

关于第一个问题，归纳说来，历史学家们在一个半世纪以来不断改变着他们学科的研究视角，以更好地看待人类的历史。吴大使昨天也重申了六千年的历史当中有一万五千个战争。六千年的历史是一个暴力史，战争连年不断。在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中国的情况当中，有一点就是它的连续性，只有中国保持了如此悠久又连续的历史。埃及的历史比中国要早，但是中断了，而中国人则牢记着他们的历史。他们牢记着战国之后，第一个帝国的时期，秦始皇时期，是如何混乱又是如何重新整合起来的等等。我难以想象吴大使如何看待欧洲人，当中国人在编纂自己的典籍、律法和像《孙子兵法》这样的伟大著作时，欧洲人还生活在山洞里呢。但是文明改变了我们。经过长年战争，是欧洲第一次公开地谴责战争罪，体现在 1599 年的《南特敕令》中。我们不能原谅战争的暴行，但却可以忘记，这两者是很不同的。后来欧洲又开始了连续不断的宗教战争，国王亨利四世结束了暴力战争，我们维持了 400 年的和平，当时一些国家宣布成立，还签订了一些公约。

其实，无论那个国家，参加战争的人都有一种强硬的立场，都不能心平气和地承认自己是罪犯。所以我们才有法律，由不同的仲裁机构来判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看看战争。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是中国人，例如我已经提到的孙子，可能我的发音不准确。很早就出现了国际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五千万的死亡，可见人类喜欢战争，而且在不断地发

动战争，他们乐得其所。朝鲜南北战争、造成几百万人的死亡，而且退回到最原始的历史状况中。犹太民族在中东也不断地出问题，其间已经有五场战争，到现在也没有恢复和平，战争却什么也没改变。从死亡人数来看，伊朗和伊拉克也是一个例子，可能有四到五百万人无意义地失去了生命。还有一些中小战争，像厄瓜多尔和秘鲁，一些山区的战争等。传统的战争不再能起到平衡的作用，所有的战争之后，人们又回到战争爆发前的状况。你们同越南的战争，最终也没有什么结论。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集体的压力阻止着人们做太过分的事情。

第三点，不久以前我们商讨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通过这个条约，美国人也没有通过这个条约，我对此很感兴趣。但是将来你们会看到国际公众舆论的判断。我昨天被邀请参加一个活动，就是在中国人民网上与网友进行一些国际问题方面的对话。

第四点，现在已经有有了一个共识，但动机却非常不同。共识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共同解决那些问题我们都会走向灭亡。这就是不容忽视的地球变暖和臭氧层减少现象。我曾在八年期间担任美国一个机构的成员，我知道现在路易斯安那、新奥尔良的环境都遭到破坏了，科学界正在把这些问题同臭氧层破坏结合起来，以后美国会签订关于能源和环保的条约。我觉得年轻的美国，相对不那么年轻的欧洲和古老的中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都在这方面不断的积累经验。以后美国会签订关于能源和环保的条约的。我们都认为对能源的过分消耗是罪恶的。

中国总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对现实的世界进行思考。我们现在很有礼貌地成为了朋友，我想谈一件人们都知道但不太愿意说的事情，就是国际标准，谴责专制行动，谴责刑讯等等，要尊重基本的人权。从历史上我们有不同的观点，西方在人权方面的发展甚至造成一个无法管理的社会，但你们中国恰恰相反，你们执着于儒家的思想。也许是因为中国太大了，我承认这一点。而且我也想到了西藏问题，当然我不会在此谈很多，30年之后我相信我们在西藏问题上的思维方式可能是一样的，这是一种趋势。人们要拿起武器来解决这些重要的问题的话，我想成功的几率是越来越低的。解决问题的话要通过其他方式，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当然会有一些倒退，还会出现战争，但是人民并不愿意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而国际法庭是为未来建立的。我们更关注未来，我们知道这一点，这是我所想到。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问我对世界的管理是否有一些建议呢？我是很老的政治家，当然，当我不想接受别人的建议的时候我会拒绝。在管理世界的时候，要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不是听取别人的教训。谈到世界金融体制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谈谈我们小国家的经验，但我们不可能承担同中国一样的责任。刚才我们听到了斯洛文尼亚的情况，库昌先生介绍了本国的历史。他们创造了奇迹，保护了一个国家，但他们的人口只有两百万，而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但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共同做些什么呢？现在的世界信息膨胀，传播交流的速度非常快，我们接受了一些共同的原则，而朝鲜、古巴和中国不在之内，有些贸易中国也参加了。我们面临着一些不稳定的风险，因为你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国家。经济学界都认为我们处在一个金融的火山口上，美国每天借出的19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对中国的占到了35%。我们想问为什么你们那么好心地借入这些价值每天都在减少的资本？我想我们应该一起来讨论金融体制稳定的问题，现在它处于爆炸性的状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协议来重新确定国际金融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中，你们是除了日本以外最大的借款国，中国自己也说，这种状况很疯狂。国际金融体制已经是无法控制了，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稳定的。当中国说出这样的话时，欧洲也可以开始说了。如果我们一起谈谈，这将是非常好的事情。

你问我们有什么共同的想法提出来，我想现在经济和金融体制的变化是非常残酷的，新的资本主义的运作非常有效率，这是非常积极的，但也很不稳定。而且我们的代价是牺牲别人，一部分的拉丁美洲和非洲，还有一些小的国家，老挝、缅甸等等都是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这很自私，我们应该加以控制。当然非洲和拉丁美洲给我们带来的移民问题和恐怖问题以及向我们出口的毒品，我们必须制止，我们应该更加严肃地进行相互合作。中国已经在摆脱非常贫困的状态，我们承认中国有权利来先关注自己，再去关注别人，这非常正常——如果六亿农民还非常贫困，那你们确实应该首先关注他们。你们块头太大了，要先致力于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们可以跟美国人说，我们现在这个游戏非常危险，很残酷。我是亲美的，我知道其实美国也很不幸，他们所代表的是非常危险的思潮。我们不可能一起来改变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对美国的想法提出质疑，可以把这个世界引向另外一个方向。亚洲现在正经历财富的增长和快速发展，不仅仅是中国是整个亚洲都是这样的。你们亚洲可以单独行动，可以有报复的权利，这是很可怕的。的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你们可以报复，当谈到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也感到耻辱。如果亚洲单独行动的话，你们会赢得胜利，因为在未来的几年当中，你们将占有世界财富的一半，并且占据国际贸易的一半。所以在世界贸易组织当中你们会有更大的发言权。所以从现在开始就要去做，比如跟日本达成协议，完全可以以和平的方式去发展，并且通过国际合作来巩固你们的力量增长，这就是我所想到的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关于第三点，我想说整个知识界甚至经济学界的知识分子都没有对世界做出很正确的判断。我们非常高兴看到自己从苏联的进攻威胁中解放出来，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解救了我们，它带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由，从而带来公民的自由，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我们对细节暂时不进行讨论。法国有一位伟大的历

史学家叫做布罗代尔，他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进行了区分。市场经济是客户和市场之间的矛盾，需要竞争，不需要垄断；而资本主义最终目的是要进行垄断。它们的游戏规则不一样，当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演变的情况也不一样。我们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在1929—1932年的经济危机中，在美国、德国都有人饿死，人民以为资本主义可能会消亡，这导致了独裁者的上台。二战结束以后，大家以为资本主义会消亡，但它依然存在。我们有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期，没有出现系统性的经济危机，而且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有所减少，**因为我们的三个调控工具发挥了作用**。第一是凯恩斯发明的工具。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拥有各自的货币，这个系统是不稳定的。你们有货币权利和财政权利，就必须管理这两种权利，遵守一些必要的平衡机制，凯恩斯指出了如何管理这两种权利，以防止货币市场系统出现混乱。第二个调控工具就是社会保障。它的创造者是贝黑兹先生。你们中国人正在致力于市场建设，而市场总是不稳定的。你们应该实施医疗保险、退休保险和失业保险。这不仅是福利制度，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起到稳定的作用。如果你们下决心拿出财富的1/3甚至是1/4来防止经济的不稳定，那么像西方1929年那样的经济大危机就不会出现。弗雷德曼先生曾说到过这一点。前两种调控都有很多理论阐释，而第三种控制机制由美国人发明的，简单地说就一句话。这句话是1931、32年左右经济危机刚过去的时候一个美国人说的，他就是亨利·福特，他说：“我发职工工资就是为了让他们买我的汽车。”一语道破了一个重大原理。资本主义可以完成大规模的生产，但必须有前提条件，就是大规模、高品质的大众消费。我们在战争之后就是这样做的，当时也采取了提高收入的政策，之后我们经历了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繁荣时期，我们赢得冷战的胜利其实就是在经济上赢得胜利。所以经典资本主义的力量可以保证我们做任何事情，而70年代开始我们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模式。

你们现在也面临这样的选择，现在有一些重要著作解释市场的平衡是可以优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可以建成市场的最优平衡，如果国家的干预破坏了这种平衡，是很糟糕的。30年当中，在西方重新出现了贫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也在进一步加剧。我们无法吸收10%的大量失业人口，因为我们社会参考的经济标准不再是工资，而工资可以保证消费水平，而我们现在的参考标准是利润，这很残酷。所以在1997年，我们遭遇了金融危机，包括亚洲的金融危机。你们对资本主义有两种认识，欧洲比美国更多关注社会问题，但我们还是破坏了股份制的资本主义。但也许你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我想说的是，中国应该面对这些问题，认清这些问题，资本主义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我很谴责弗雷德曼的国际法理论，虽然谴责一种理论是不太合适的。谢谢！

米歇尔·罗卡尔（中欧论坛创始人、法国前总理及欧洲议员）

我在这里发言因为布朗热先生提到了我们之间的一些分歧，我想告诉中国朋友们，你们从外部观察我们是非常重要的。50年代我是赞成欧洲的联邦主义的，我将继续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是我也更加悲观，我想我们应该同意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比如刚才布朗热先生最后所说的，任何国家都不会同意在欧洲内部被单独看待。土耳其可能只有一个特殊的、单独的地位，这对土耳其来说这是一种侮辱，我们对此不会表示反对，我不再相信欧盟能够对一个新的成员说“不”，因为它从来没有确定一个积极或消极的标准。而在欧盟内部，一些国家从开始以来一直在玩“战略牌”，坦率地说，应该承认我们是在美国人来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英国人的游击战争挽救的。如果英法不和解，就没有法德的和解。英国进入欧盟是为了防止欧盟成为超国的机构，但是英国人得胜了，他们是最积极要求欧盟接受土耳其的。我也是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不是欧盟内部的原因，赞成土耳其加入。我想如此加强欧盟的机构，我们会失败的，我不相信所谓的“加强合作”，因为它太复杂。并且欧盟从来没有能力谈它的边界，因为欧洲是一个机体，作为一个机体要谈边界问题，只能是从军事上来保证，但是欧盟没有这样的权力，现在是各成员国自己负责自己的安全和防务问题。冷战期间，法国人已经激怒了美国和其他一些盟国，有一半的欧盟成员国都不愿意有共同的外交政策，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可能就会造成自己和美国的对立。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不是能够改变，也就是说从机制上欧盟不太可能形成一个自己的共同边界，但是我们也不能低估以前所做的努力。15年前，波音和道格拉斯决定合作，来控制飞机市场的80%，因为欧洲市场的竞争是受到保护的，而美国市场接受这种做法的，现在我们所有的政府是自己来控制自己的军事指挥。《伽利略条约》和《伽利略合作》对中国是很重要的，GPS是美国白宫的一个礼物，美国希望继续控制第二代这样的战略武器，但是一旦欧洲的工程师们参与“伽利略工程”的时候，美国人就拒绝他们的参与，这是战略性的。我们本来是可以和美国人共同管理这个世界的，但是欧洲人没有这样说，美国说我们不关心战略，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权利。马上我们就自己做了《伽利略计划》，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说明。

所以我告诉中国朋友，当你们进入国际贸易组织的时候，欧洲已经站在你们这一边了，不是作为援助，而是某种非常重要的因素。欧洲已经在国际贸易组织中有自己的分量，可以强加一种规则，在人权和制造和平方面已经做得不错了。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武力的地位越来越小，欧洲已经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三年以前，人们还非常悲观，还说巴以和平是不可能的，这太困难了，他们相互仇视。我是作为一个少数派说这些话的，因为布朗热先生提到了我的观点，我是为了使你们理解这个问题，欧洲不是军事上得到保护的一个边界、一块领土，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像乌克兰加入的时候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还有其他的国家，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没有能力设计一个领土内的欧洲。我们必须指出人权是我们法律的基础，还有就是遵守市场竞争的原则，现在欧洲已经在这两方面发挥了作用。有一本名为《欧洲之梦》的美

国人写的书是值得看的，你们可以看出军事和外交使欧洲的弱项，而美国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不可能去做不可能做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在文明和贸易方面，我们要把欧盟建设成一个法律基础上形成的统一体。谢谢。

总结环节

米歇尔·罗卡尔（中欧论坛创始人、法国前总理及欧洲议员）

今天让我在这里做总结，我感觉到有一些为难。我前面已经有五位作了总结发言，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我没有太多需要补充的了。如果说对我们这几天的工作作一个回顾，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组织者。他们的工作得非常出色，实事求是地回顾一下，这几天的工作确实令我们非常难忘，非常新鲜。因为多年来欧洲人、中国人都有着非常特殊的经历，不是通过官方的渠道，而是通过两国人民之间，还有两国学者进行自由的交流。好像大家都常讲的一句时髦的话：“通过公民社会来对政治生活施加影响。”这也是我们交流的主题，应该说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一直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我们看到欧洲方面的与会者或者是在政府担任很高的职位或者是在学术上有很高的建树，他们花了一周的时间来参与这些讨论，主要是表示了对中国问题的一种关切，虽说还称不上是焦虑，但程度也差不多了。我不会说我们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担忧或者是恐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心怀恐惧地去工作，我们只是认为跟中国的交流是非常必要的。我想告诉亲爱的中国朋友们，我听到三位中国学者在讨论发言的过程中说到中国非常关注欧洲，而且他们看欧洲的历史并不仅仅是从教科书读来的，不仅是看我们过去的优缺点。中国朋友现在有权利以一种讨论、辩论的方式和我们共同研究欧洲，和我们在座的所有欧洲朋友一起进行分析，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对欧洲将来的政治梦想和政治前途作出一个最好的理解。对一些主要的问题，比如说防御问题等，美国的观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及欧洲人看问题的方法，综合这些我们才能变成世界蓝图最好的规划者、构想者，创造一个大家都可以和谐生活的社会，让各个国家、各国的人民都可以在和谐的条件生活。

我个人对欧洲的前途并没有丧失信心，也许我属于少数。我不相信战争，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还有另外一种观点或者是另外一种选择。我们可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处理冲突，一种非暴力的方式。与过去解决冲突的方式不同，我们可以通过世界范围内的有效谈判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应该说欧洲的建设是有限制的，我现在看不出在什么情况下中欧有任何相处的限制。所有方面的限制都应该被突破，在法制的前提下，推崇民主、人权、自由贸易、自由交往等等，这些有效的工具都会把中国推向全球，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这次与中国同事们的见面、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可能有些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式的讨论或分析。在此我想说，欧洲和中国的相聚，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文明的相会，实际上这对世界的发展起到了一个指导性的作用。欧洲和中国加起来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的文明对世界长久以来的发展以及它将来的命运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欧洲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这次研讨会主要涉及到我们的集体利益，中国人的利益和欧洲人的利益，这也使我们能够就一点做出非常精确的分析。

今天我们的讨论会对能源问题没有过多地强调，之前伊沙贝尔·迪朗说，我们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这个问题和全世界的发展紧密相关，尤其是大家要发展核能，但是核能又带来一些问题，这些还没有得到充分和展开式的讨论。无论在欧洲还是中国，大家都在致力于发展可再生能源，比如风能、核能、太阳能、沼气等等，我觉得大部分欧洲人也非常赞成在这方面做出努力。**我知道中国每年电力需求的增长率是20%，几年就要翻一倍。不到十年电力的消费需求就要增长一倍，那么我们怎么办？完全用煤吗？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如果用煤，可能要不了多少年就会使资源枯竭。**所以我只想跟大家说，请增加一点同情心，少用一点能源。最好是发展核能，我认为大部分的欧洲人会这样建议你们，对中国人这样讲，并不是从欧洲个人的利益考虑，而是从整个世界和全球的利益出发的，就是说发展核能可以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紧迫问题。在前天早上的发言中，讲了很长时间关于金融体制和财政手段方面的问题，因为金融体制现在遇到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中国的金融形势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我想应该实行一种非常明智的财政政策。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的“布莱顿森林体系”的谈判，谁能够引导我们建立这样一个新的体制？我想只有中国和欧洲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说服美国朋友，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的是决定性作用。我们的美国朋友很年轻，有时候会有一些不民主，而且易怒。中国和欧洲有着古老的文化，有着文明的传统，我们可以用古老的文化传统对付有些人的易怒或不冷静。中国的文明有5000年了，欧洲可能相对中国来说年轻一点，但是美国更年轻，他们只有200年的历史。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应该进一步合作下去，为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利益努力工作。希望我们下一次的研讨会可以改善这次会议所有的不足，可以更好向中国朋友介绍欧洲，我们也可以在再次来中国的时候看到中国更多的变化。你们拥有相当于欧洲2.5倍的人口，而你们50年中所走的路是我们过去很长时间才可以完成的，所以你们在前进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很多问题，可能也会有很多新的领域需要探索，只有通过辩论和讨论才可以进行正确选择。我已经准备好以后继续参加这样的活动，谢谢大家！

米歇尔·罗卡尔（中欧论坛创始人、法国前总理及欧洲议员）

我并不信教，但是如果上帝还让我活下去的话，我肯定会来的。我还想说一点，二十一世纪让我感到害怕，可以说在世界各个角落我们都有一点失控，我认识最深的是法国和欧洲大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大陆上暴力正在发展，而且我们在逐步失去秩序。而美国的政治将可能加剧这种暴力和人们之间的仇恨，并不仅仅是指那些百分之一的穆斯林恐怖主义分子，而是整个的穆斯林世界，还包括其他的基督教世界和佛教世界，我们不太清楚。我的感觉是目前这些问题的处理得都不太好，而我认为答案就在于我们更应该相互倾听。中国和欧洲凭借自己的努力能够做到这一点。只要我还有力气我就会继续参与以后的讨论。